

蘇聯印象記

邵宗漢 譯 韋勃 著

生活書店發行

蘇聯印象記

著 勃 韋
譯 漢 宗 邵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蘇聯印象記

每冊實價肆角

外埠酌加郵費

原著者

韋勃
(Sidney Webb)

譯者

邵宗漢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霞飛路
第五九三號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
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
再版

目錄

- (一) 英國韋勃夫婦的事業與思想(代序)…………… 一
- (二) 蘇聯的經濟生命…………… 一五
- (三) 蘇聯的勞動狀況…………… 三〇
- (四) 蘇維埃統治下的自由…………… 四三
- (五) 蘇聯是不是民主政體?…………… 五九
- (六) 蘇聯的出版事業…………… 七三
- (七) 蘇聯的婦女兒童與家庭…………… 八九

插圖目錄

蘇聯新建世界最大水電廠慶祝五一節	一四後
四伯利亞新建之大鎔鐵廠	一五前
諾華西比爾克之鐵路工人住宅	三〇後
薩拉多夫聯合耕種機製造廠內之工人技術班	三一前
普羅羅詩人那洛夫與工人代表簽訂合同約定工人保護普羅羅詩人並矯正其錯誤	四二後
女犯在監獄中哺兒	四三前
蘇聯要人	五八後
七谷曼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中之工會代表聆聽報告	五九前
蘇聯城市中之書店	七二後
蘇聯自製之捲筒報紙	七三前
女少年先鋒在莫斯科演說	七八後
蘇聯婦女學習看護嬰孩之技術	八九前

一 英國韋勃夫婦的事業與思想

韋勃先生(Sidney Webb)可以稱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預言家。韋勃夫人(Beatrice Potter)是第一個認識職業組合主義與合作——這是薪給勞動者出於自願的兩大運動——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程中所負的主要任務。韋勃先生不願人家喚他巴斯斐爾爵士 (Lord Passfield) 因為他的接受爵位，乃由於英國工黨政府需要他在上院服務。而韋勃夫人也決不可稱為巴斯斐爾爵士夫人，因為她不願享受丈夫被強迫而致的高貴，已經堅決地拒絕接受爵位了。

他們兩個人對於社會主義將怎樣實現的幻想，也許很不真確。他們的社會主義，在作爲政治的策略看來，也許缺乏強固的獨斷的哲學基礎。對於方法，對於人，他們也犯着

許多錯誤。但是，他們却緊緊地把握住兩點：他們相信社會的經濟生命在於有計劃有秩序的基礎，他們並相信這樣的社會僅能建築在堅密的、活潑的勞工運動的基礎上。

他們的一生爲改良主義的優德而說教，以改良主義爲達到新社會秩序的階梯，他們熱烈地擁護英國工黨的改良主義政策，並且願意採取社會主義者與非社會主義者的一切合乎人情的手段，爲社會主義而努力；到現在，他們目覩他們所最愛護的理想，却在方法與意識形態極端不同的社會主義者集團的發動下，真實地完成了。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他們夫婦兩剛由蘇聯回來，他們是到蘇聯去親自考察計劃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真相。

在研究他們的思想之前，我們先來考查他們一生的重要事業。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三日，韋勃先生已是七十三歲了。十九歲，他開始就文官職務，繼續十三年之久，而以在殖民地工作的時間爲最多。在那個期間，他並執行律師職務。一八九〇年，他辭去文官職務，一八九一年以費邊社（Fabian Society）候補人資格被選入倫敦州會議（London

County Council) 他自己是一八八四年組織費邊社的贊助者。在州議會中，他又連任了十八年。在那個期間，他兼任實驗教育委員會 (Technical Education Board) 的主席。從一九〇三年至一九〇六年，他服務的職業組合法皇家委員會 (Royal Commission on Trade Union Law) 及其他重要團體。他同夫人 (Beatrice Webb) 結婚是在一八九二年。韋勃夫人比他年長六個月，是經濟學與社會學的著作家，與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有很密切的私人接觸，在思想上受了他許多影響。她與韋勃先生結婚的時候，『英國的合作運動』(『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 一書已經出版，並為善斯 (Charles Booth's) 主編的『人民的生活與勞動』(『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le』) 撰稿。

韋勃夫婦共同著作的第一種，當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職業組合主義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此後他們的共同著作，絡繹出版，如英國地方政府歷史叢書，著名的少數民族報告，以及皇家委員會的貧民法與失業法。在勞工運動中，他們思想方

面的勢力逐漸穩固。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創立，他們盡了很大的力量。韋勃先生並擔任行政學教授。一九一三年出版的『新政治家週刊』(“New Statesman Weekly”)，也是他們鼓吹發起的。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五年，他任工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二二年，第一次被選入國會，一九二四年任工黨內閣商務委員會主席。工黨第二次組閣時他任自治領與殖民地事務大臣。

韋勃夫婦的一生，不顧小我地，虔誠地努力着，使社會主義成爲改造社會的具體的，可以實行的計劃，並且成爲新社會的一種幻象。他們雖從未放棄掉他們的理想主義，但能夠嚴格地使它規律化，能夠限制它。他們要建設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因此對於社會主義運動的基礎懷着不能滿足的好奇心。當別的社會主義者唾罵職業組合主義是一種反動，是熟練工人幽禁在工銀制度的意識形態內的一種貴族政治時，他們却開始去寫職業組合主義的歷史，並且把職業組合主義定爲社會主義者的信仰與教旨。差不多只有他們兩個人贊助消費合作運動，批評消費合作組織的功能與方法，並設法改進，使它

成爲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必要成分。因爲深切地感覺到地方政府法典的重要，他們便不憚勞悴地耗費許多年的光陰，寫作英國地方政府歷史叢書，並闡明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法典與地方法典的正常關係。他們不迴避任何艱苦的工作，即使他們的重大性不爲世人所認識，他們依然一刻不肯放鬆地繼續進行。

自然，他們的思想也有界限。他們並非十足的國際主義者，也從未意識着英國的政現狀是奇突的歷史上的偶然。事實是這樣的，自馬克思以後，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思索，幻想，超過任何社會主義者，他們常常準備着依據環境的轉變去修改他們的意見與計劃。

雖然列甯與史太林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同費邊社會主義有很大的差異點，但他們終身所努力奮鬥的目標與蘇聯目前已經真實地完成了的共同點，其重大性却遠在差異點之上。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基本信仰，使他們必然瞭解這一點，並且他們的判斷也必須根據蘇聯的試驗。實際上，主要的差異點在於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而不在于社會

主義實現後的基本質。至於差異點的產生，一部份由於英俄兩國的政治條件與經濟條件的不同，一部份則實由於思想與表現的分歧。當共產主義者為奪取政權而鬥爭的時候，似乎與費邊社會主義者，有多少相同的地方，可是，在共產主義者已奪取政權之後，他們却毫不猶豫地建設起新的社會，這新的社會却與韋勃夫婦在過去四十年間所極力主張的有許多相同的地方。

在韋勃夫婦開始奮鬥的時候，英國的工黨還未產生，沒有所謂社會主義運動，至英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連小小的淡形也看不出。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很少，就是有，也未會研究過馬克思的學說，或者雖研究而仍未瞭解。韋勃夫婦對於馬克思，也知道得有限。他們是從完全不同的經濟與政治的環境中，由穆勒與祁文斯（John Stuart Mill and Stanley Jevons）的傳統思想，轉向社會主義。（穆勒與祁文斯是 Jeremy Bentham 的承繼者，是實利主義的信徒。）

實驗主義在觀察某一特殊事物的贊成面與反對面的意義上，是正確的，選擇的，合

理的；對於事物的一般化與熱誠是冷漠的，懷疑的。個人主義與放任主義，遵循着穆勒的思想路線，過渡到改良社會主義，改良社會主義的完成大部份由於特殊的社會改革，每一種的改革須合於『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的原則。而這改革是逐步採行的，並且願意接受各方面的助力去完成改革。韋勃夫婦的改良社會主義是實利主義與進化論的混血兒，期望新的社會主義社會，經過繼續不斷的，逐步的轉變之後，將漸漸地由資本主義中脫胎出來，好像沒有經過社會主義運動去加速實現的樣子。韋勃夫婦並且堅決地以爲進化的潛力是急速地，確定地傾向於社會主義。

馬克思在他自己的立場上，也堅持社會進化論，也深受着進化論的影響。但馬克思根據了黑格兒的辯證法，以爲社會的進化由於不斷的階級鬭爭，與連續的社會革命。而韋勃夫婦却以爲進化的過程是漸次的，非激越的。馬克思的思想主要地根據於大陸國的條件，那時，議會民主政治的形式尙被大陸國否認着；韋勃夫婦却生長在除婦女參政權以外，議會民主政治業已完備的英國，利用議會去逐漸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在他們看

來，似乎沒有內涵的不可能。因為韋勃夫婦的理想當初尚未試驗過，英國也未有工黨政府建立起來與真正的危難相周旋，所以，他們不免要這樣懸想，繁榮的資本主義制度將繼續維持它的地位，直到社會主義者逐步準備妥當的時候為止，在過渡期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將並行而不悖。

但是，當初的韋勃夫婦雖深信必然地要經過改良階段，却從未以局部的，片斷的社會主義幻象為滿足。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運用與理想，懷着濃烈的興味，因此他們要目觀完全在建設程序中的社會主義社會，到底是怎樣，同時也要使人家知道。他們攻擊資本主義制度的無計劃與無秩序，從未鬆懈，對於樹立有計劃的與有秩序的經濟制度，使財源的調節統制權由大眾去掌握，也同樣地努力着。他們要將實業成為公有公管。不過，公有公管尚非他們的全部目標。他們以公有公管為手段，去完成國家經濟生命的合理計劃，使各種生產能夠規則地相稱，使財富的分配能夠適合新的生產秩序，並且能夠供應一切必需物品的欲求。

總而言之，如目前蘇聯所實行的國家計劃經濟的思想，整個地包含於韋勃夫婦關於社會主義的著作中，掩藏在他們不斷的宣傳後面，他們的早期著作以及費邊社所發行的短文，均可以顯示出這一點。他們計劃經濟的思想，不僅普及於英國的社會主義者，並且影響到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他們在大戰後的兩部著作——『社會主義政治之憲法』與『資本主義文化之崩潰』（“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and “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最明白地表現出計劃經濟的概念。

在上述著作中，有許多地方，尤其關於政治方面，與蘇聯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大相懸殊。韋勃夫婦的思想，在最近的轉變之前，常常拘泥於英國的條件與英國的政治狀況。譬如說，因為他們承認了議會民主政治的存在，便不得不主張議會民主政治是社會主義的基礎，最大限度也不過考慮到怎樣去改進它的形式與運用吧了。他們的理論根據於勸導而不是強力。他們的規劃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運用議會民主政治的方法下轉動着，有毫不受箝制的言論自由與私人批評。他們在社會主義政治之憲法一書中，採用『

估量與公開的原則』(The Principles of Measurement and Publicity)他們顯然在思忖着，社會主義社會對任何批評，應該給予完全發表的機會，對於政府各機關的真實進行狀況，應該十二分精密地暴露出來。這與共產主義者的態度，自然是大不相同了。韋勃夫婦主張對於社會化的生產效率，須加以十二分謹慎的估量，這一點，史太林與他的同志們當完全表示同意。蘇聯五年計劃的進行，以『統制數字』(Control Figures)去檢核成績，而『統制數字』實由估量產生。共產黨的長期自我檢閱，以及繼續不息地嚴防整個經濟制度中任何一部份的鬆弛與怠工，在這一切的後面，估量具有絕大的作用。不過，講到公開，却是頗有出入了。照韋勃夫婦的意見，所謂公開乃指批評的絕對自由，不僅限於社會主義經濟結構中任何特殊部份的效率，並且及於整個的社會主義制度。所謂公開還含有信仰自由的意思，不論爲非社會主義的批評，或爲反社會主義的批評，也一律在容忍之例。

政治上與宗教上的信仰自由，久已成爲英國的沿習，它是經過了長期的，苦痛的奮

門的結晶；要使一個英國人想到走獨裁的一條路，事實上很難，因為那似乎要他放棄過去的許多光榮與勝利。信仰自由對於英國的社會進展有過很大的貢獻，而英國的社會主義就是生長在這一塊泥土上。以上並非指信仰自由能夠抵抗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制度直截挑戰的勢力，不過說明英國人——連社會主義者也在內，為什麼不願放棄信仰自由吧了。信仰自由的本身有偉大的價值，它容忍社會主義的滋長，許多人轉變為社會主義的信徒。所以，問題就在這裏。現在是否必須放棄掉信仰自由呢？而且，馬克思以為社會主義的實現，階級與階級間必經過激烈的，不能限制的鬭爭。這臆斷到底真確不真確呢？

事實上，就是在蘇聯業已實現共產主義的今日，英國的社會主義者還難於相信馬克思的立論，在他們看來，階級鬭爭的簡單定義並不怎樣適合於英國各個階級的實際妥協。在單純的資本家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之間，尚有龐大的中產階級包括熟練工人，薪給勞動者，機械師，專門家，小商人及小資本家。自然，其他各國也有這些中間集團的

存在，但決沒有英國的中間集團那樣充實，那樣接近社會主義。費邊社的信徒大都就是這中間集團的份子，英國工黨各地支部中最活躍，最有勢力的，也就是這些份子。

韋勃夫婦的改良社會主義，由資本主義制度中逐漸地溫和地孕育出計劃經濟的意識，特別獲得英國中產階級的聲援，一方面固由於英國的中產階級恐懼騷擾，動亂，憎惡鬪爭，愛好信仰自由與安逸生活，另一方面則由於計劃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秩序，有力地誘惑着他們的思想。他們目覩現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浪費與無秩序，因此想極力去謀改造，去謀糾正。但是，他們却保持着嫩弱的獨立性與已成的地位，憎惡激烈革命與國內戰爭的思想。

因為有了這些外在的與內在的種種關係，共產主義未能在英國樹立深固基礎。但是，近來許多的中產階級份子，連韋勃夫婦也在內，對社會主義是否能夠溫和地由資本主義蛻變而成的一點，已慢慢地懷疑起來了。工黨兩次組閣，對資本主義的整個組織，並未能給予任何新鮮的印象，一般人的懷疑乃愈甚。

韋勃夫人對這方面的感覺，比韋勃先生要比較深切，因為他們的思維各有特點，前者是敏銳的，富於想像的，後者是規則的，系統的。還有一層，工黨兩次組閣時，韋勃先生均任要職，公務纏身，而韋勃夫人却能置身事外，清楚地觀察一切。據我猜測，恐怕還是韋勃夫人迫切地要到蘇聯去視察真相的吧。

韋勃夫婦為英國的社會主義苦心工作了數十年之後，在今年（一九三二年）的春天，終於親身往蘇聯共產黨正在努力建設着的驚人的新世界去觀光了。蘇聯熱烈地接待他們，尊為新社會制度的光榮預言家。他們在三十年之前，就想像着這樣的新制度。雖然他們與英國進化論的改良社會主義的思想有着密切的關係，但他們對於蘇聯共產黨運用有紀律的獨裁為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工具，一點也不表示驚駭。

韋勃夫婦周遊全世界回來以後，非常敬慕日本，日本人知道自己需要些什麼，依了一定的方法去幹。可是，他們却沒有看出中國人的優美品性。中國的無組織以及公共集團的無能力，給了他們不好的印象。他們最討厭無政府狀態。他們說世界上的一切事件

是有組織者與無組織者的永恆衝突。他們自己是有組織者，他們以爲史太林也是有組織者。蘇聯的革命已經由鬪爭的階段到達建設的階段，所以，蘇聯的統治也已由無組織狀態到有組織狀態。章勃夫婦如果於一九二〇年到蘇聯，無異出水之魚，但在一九三二年到蘇聯，則頗有賓至如歸之概了。

這兩位改良主義的使徒到蘇聯去視察，由非常手段造成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建設以後，將發覺蘇聯社會的基本組織，與他們所幻想着的未來社會主義社會，頗相吻合。他們目視一生的夢想到底在蘇聯怎樣實現起來。蕭百納在經濟問題的研究上師事章勃夫婦——自蘇聯回來後，成爲蘇維埃制度的熱心擁護者，那末，蕭百納的兩位老師將格外精密地，毫不誇張地寫出他們對於蘇聯的印象來，作爲餽贈給史太林的禮物吧。

二 蘇聯的經濟生命

就是承認了一切敵意的批評，蘇聯今日的經濟狀況仍與各國有特殊的差異。蘇聯的生產總量，一年比一年增加。雖然還未脫離落後的狀態，但蘇聯所生產的以及所分配的煤，油，鋼，鐵，穀物，靴鞋等，今年終是超過往年。同時，世界各國却不是生產低落，便是生產過剩。

誠然，蘇聯的新工廠確有因缺乏良善的管理，熟練的工人，特殊的要件，或因其他技術上的缺點而停頓起來。但在西歐與美國的主要實業工廠，不是一家二家地停頓，却是一批一批地倒閉，不過倒閉的原因，則沒有像蘇聯工廠停頓的那樣明顯。在去年的夏天，蘇聯每一個城市裏充滿了建築的聲浪，差不多到處分着三班，輪流工作。工廠，工人住宅，

醫院，俱樂部，學校，科學館，政府辦公處，大規模地趕造起來；同時在其他各國，幾乎看不見新的建築，營造師餓着肚子，大部份的建築事業無限期地延宕下去。

蘇聯在過去二年間，完全不要顧到失業救濟的問題，因為政府能夠按照職業組合規定的工資率安插任何找尋工作的人。同時在其他各國的失業者，却佔據了全人口的十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所有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一致承認不能救濟失業。這一點，蘇聯的工人決不能忽視的。

莫斯科國家出版部每年出版的書籍，要超過德國、英國或美國各出版機關的總量，因為平均銷售廣大，政府在這一方面所得的利潤，要較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版商所得的利潤為多，一些也不要剝削著作家。蘇聯的出版業如何會這樣的發達呢？這大概由於蘇聯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今年又增加了教育費的關係吧。據調查，蘇聯對於一萬六千萬人民中每人所用的教育費，超過英國為四千五百萬人民中每人所用的數目。然而，蘇聯的財富生產額與人民生活程度，同美德英任何一國比較，仍相差頗遠，這

相差，既非由於工具的不同，也非由於方法的互異。凡耕種收穫，開採製造，運輸交通，分配消費，以及一切人類征服自然的事情，俄國人差不多用了同樣的方法，去戰勝同樣的困難。他們一面用最進步的收割機，一面還沒有拋棄舊式的鐮刀；一面用最新式的自動電氣打穀機，一面還敲着最原始的鎚子。至於說蘇聯的人力較為優秀，也是不準確的，實際上，蘇聯深切地感覺到人才的不濟。對於從前黨人出身的政治家，以及久受壓迫而現在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均不能不存這樣的感想。

蘇聯與各國的最大差異點在於實業資本的所有權與管理權。除了極少數的例外，不論是在英國或美國，基地，工廠，機器以及一切商品生產與分配的工具，均係個人或數人的私產。這些企業均由主人自己管理，或由人代為管理，其餘佔最大數者則僅幫助主人，製造利潤，可是，蘇聯的情形就完全相反了。基地，工廠，機器，一切生產，分配與交換的工具完全公有，不論屬於地方的，或是屬於中央的。蘇聯各種生產事業，除了舊式手工業與農業，完全爲了現在的與未來的廣大民衆，製造必需的，期望的大量商品，外而一點沒有

爲了任何個人或數人製造利潤的動機。

那末，蘇聯生產組織的形式到底是怎樣呢？我現在先從中央政府說起，中央政府就是所謂聯邦政府，聯邦政府的權力集中於聯邦人民委員會（Совнарком），由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及各部人民委員十五人組織而成。人民委員會中至少有十三人專注於商品的分配與工作的組織。這樣，生產全歸中央指揮。人民委員會下附設着近一百個不同的委員會，（在一九三一年稱爲托辣斯），其中七十三個屬於重工業，二十六個屬於輕工業，每一個委員會對國家生產的特殊部門負責。

近一百個的委員會統制着八千個礦產、油井及工廠等的企業機關，並有權委任負責的經理或監督。經理或監督直接受委員會的監視，自行選擇一般的與專門的職員與工人，蘇聯的任何企業機關，差不多均係自行選擇職員與工人，上自經理助手，下至學徒，無分軒輊。關於重要職員的措置問題，由經理或監督自行解決，關於其餘重要工作則由各種小組委員會共同磋商，負責進行。所以，我們即使以爲各種生產事業給中央政府操

縱，蘇聯仍沒有單純的獨裁或個人的獨裁一類事態存在。實際上，從事於集中化的生產事業的一萬左右的經理或監督，均依公平的標準僱用一般的與專門的勞働者。

蘇聯其他事業的組織情形，也是大同而小異。蘇聯的鐵路事業歸運輸人民委員會管轄，運輸人民委員會對政府的輸入與輸出，負責處理，運輸與金融的工具，好像是兩架大機械，前者在產生轉運，後者在產生信用。公共事業與社會娛樂的組織情形，亦復如是。日常商品的分配大都由廣佈的消費合作社主持，統計蘇聯消費合作社的登記社員，將近八千萬。各消費合作社自行選任地方委員，經理與職員，在組織系統上，各消費合作社有合組的縣委員會，省委員會，在莫斯科有全國消費合作社的最高機關（Centrosyus）。

蘇聯的整個經濟機構中，不論是什麼企業，沒有利潤的剝削者，也沒有靠資本與土地而生活的寄生蟲，這是最主要的特殊點。在一切企業中服役的精神勞働者或體力勞働者，所得的工資，均由職業組合按照了他們的等級與能力，規定幾種標準。蘇聯在有的地方也採取論件制或其他工資計算法，以促進馬克思主義的速率。蘇聯的所謂平等，決

非指死的，呆板的水平線。

蘇聯與各國生產事業的目標，有兩大點異點：第一，蘇聯的生產事業，決非為資本家攫取利潤，却是為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生產大量的與最精美的商品；第二，生產與分配並非由企業家的好惡而決定，也非由各個資本家與銀行家的估計利潤而決定，也非由一萬個國家生產機關的經理為政府打算而決定；所謂生產與分配乃是着眼於現在與未來社會的最大福利的整個計劃。

這整個計劃的範圍不僅包括工業與農業，財富的生產與分配，並且包括一切努力的總和。凡關於全人口——佔世界人口的六分之一——所需物質方面的商品，社會方面的公共事業，思想的改進以及學術的展拓，均在這個計劃之內。一九二〇年，列甯堅持蘇聯電氣化的偉大計劃。由於不斷的努力與苦心的研究，列甯的理想終於經過了『統制數字』的階級，而達到了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實施，五年計劃現於四年內完成。至五年計劃的所以能夠獲得驚人的成績，不得不歸功於國家設計委員會（Gosplan），這委員

會對蘇聯人民委員會直接負責。

每一年的計劃必須先行考核。第一步估計全國人口與地方人口的增加與遷移。爲有了確實的人口調查後，才能平均地去維持他們的生活，發展他們的身心，並使他們有平均工作的機會。第二步估計生產量的增加，譬如說，全國的生產額要多少，每一種商品的生產總額要多少，每一區的生產總額要多少。第三步決定在未來一年內假定的生產總額中，到底需要若干消耗的商品，如食料，衣服，文化用具，社會娛樂等，需要若干再生產的商品，如房屋，機械等，而且還須決定每個人的特殊需要。然後分門別類地檢核，考查估量，並預防偶然之事。

不論是鑛產，工廠，銀行，運輸，醫院，學校，以及蘇聯的任何企業，均整個地着眼於未來的一年中能生產多少商品，完成多少工作；需要多少原料，多少成分，多少原動力與勞動力；可以由商品的銷售與轉運上收入多少。同時，由四萬家私營工場組織而成的二萬五千個製造者協會，以及由一千八百萬小農組織而成的二十二萬六千個集合農場，也由

國家設計委會去估計它們的供求。此外，一千五百個大規模的國家農場及牲畜場，在一九三一年，歸五個托辣斯管理，其中有一百七十五個穀物農場，最大的耕種面積，計一百二十五萬英畝，二百個牛場，一百三十個豬羊場，五十個牛奶製酪場，及四十個棉花種植場，也在估計的範圍之內。

所有鐵道，運輸，郵電，國際貿易，森林以及財政人民委員，均須供給與各個委員會有關係的資料。至消費合作社則將會員的人數，所需商品的種類與總額，雇用的職員以及經濟的實況等，製成真確的統計，呈報國家設計委員會。

爲適應全國的需要起見，蘇聯已經慢慢地造就了全世界空前未有的大量的統計人才。他們將一切微妙的資料作爲偉大的統計工作的根據。不過，他們的統計工作，並非在數字表的公佈，其目標在指導蘇聯一切企業機關的生產量與工作率之增減，在使需要的總額與生產的總額得到平衡。譬如說，製造機械的工廠倘欲增加生產量，必須顧到鋼鐵生產量的同樣增加。假使有許多生產機關欲向外國購置原料機件等，則須顧到怎

樣使其幾種製造輸出商品的工業增加生產量，並且還須顧到國外市場的價格。這樣，才可以使輸出商品的總額，抵補輸入商品的代價。因為任何一種企業對於專門家與熟練工人的需要，逐步逐步地增加，所以在教育方面又須顧到怎樣去訓練適應的人才，去分配到各部份。

國家設計委員會一年一年地累積了各種企業的知識，憑藉了實際的經驗與可供參考的資料。於每年九月間，草成統制數字計劃書，由政府各級機關發給各個工業農業及文化機關。這計劃的臨時綱要，便由經理、監督及職員工人的各種小組委員會加以考慮討論。在過去三年中，會有許多次工人們自己備了計劃書，比國家設計委員會原來的估計，在出品上還要增加，在消耗上還要減少，在成本上還要減輕，計劃書經過了小組委員會的修正之後，呈交各個企業的總機關作最後的批判。所以，國家設計委員會計劃書到處經過覆議的手續，以便利最後的修正。這完備的，修正的計劃書草案最後呈交蘇聯人民委員會及共產黨中政會。批准後，即正式頒佈，在未來一年中，這計劃成爲蘇聯整個

生產企業的總標準。

自然，就是最上選的統計家也不能預料到來一年中的一切意外。有些意外可以在生產總額的範圍內或由預先的特別準備上設法彌補。可是，如因戰爭或普遍的災荒而使生產率受鉅大的影響時，則全部的預定計劃將發生更劇烈的變化。所以，國家設計委員會時時刻刻在工作着，打算着，並注意着在每個星期中生產與消耗的盈虧，加以必需的，無數的調整。

國家銀行也與五年計劃打成了一片。任何企業只要與國家銀行立下一個戶頭，便可支取所需的款項，但受一定的限制。凡各企業間之交易如原料商品等，必用支票來往，向主顧收到的現款，須立即存入銀行。倘發覺有違悖上述規定的情形，國家銀行馬上向國家設計委員會報告。

總之，五年計劃是理想主義的實驗。蘇聯政府深信詩人白郎寧的話：『人類的能力應該超過理解力。』這種信仰強烈地鼓勵蘇聯政府向前邁進。在全世界均陷入不景氣

狀態中的今日，向來是貧乏的，落後的。比較無生氣的蘇聯却能穩固地增加財富的生產，提高全國民衆的生活程度。這誠然是世界經濟現象的一大矛盾。

完全站在經濟的立場上看來，蘇聯依然是十分落後的國家。不過，蘇聯經濟落後有歷史的原因在。世界大戰發生，帝俄的恐慌愈益加劇。自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二年，革命後的蘇聯遭遇到着災眚，叛亂與飢荒。直到最近的十年間，蘇聯的經濟狀況方始轉變方向。我們無庸諱飾，五年計劃雖經過繼續不斷的改進，仍覺得不完備，每年發現許多錯誤，實行與計劃仍相差離。可是，沒有一個嚴酷的批評者敢說，倘使沒有五年計劃，蘇聯的生產將超過現在的數量呵。

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私人企業或許能夠產生較為幹練的經理人，理財家及實業領袖們，以營利爲目標的資本主義競爭或許更能鼓勵一般人的工作精神；但這些營利者的所謂成功與效率，並非由生產的總額去估定，更非由真實的需要去估定，而由資本家所獲利潤的總額去估定。資本家的有些企業也許有益於社會，但資本家決不著眼到這

一點。他們在增加生產量的時候，想着怎樣去奪取同業的銷路。他們只願維持或提高售價，以增厚利潤，決不願削低售價，賣給用戶。在蘇聯，實業制度與商業制度使一切生產機關整個地轉動，力量完全集中，各部不生衝突，這是頗堪嘉許的。

我們都有這樣成見：倘然私人不能營利，則沒有大宗財富的儲蓄，沒有企業的冒險心，社會便要失去它的繁榮。可是，蘇聯的經驗怎樣呢？我們知道蘇聯人民每年掙節四分之一的消費，讓將來一代的生活程度，可以確實地提高。在過去五年間，蘇聯的財富以及生產的儲蓄，與全國總收入的比例，實較自有史以來任何一國為大。講到對於企業的冒險心，則蘇聯在過去數年不願損失與潰敗的大膽嘗試，實屬空前，若干資本主義國家且有目為瘋狂者。所以，由於事實的證明，我們可以這樣斷論：私人營利對於財富的儲蓄與企業的冒險心，並非不可分離。

蘇聯經濟制度與各國經濟制度的最重要差異點，在失業問題上，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在美國、英國與德國，差不多有四分之一的人民沒有工作，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也呈着

不景氣狀態。所以共產主義者可以指斥資本主義制度的利潤，決不能加速國家的效率。可是，我們可以真確地說，蘇聯今日沒有普遍的失業。據蘇聯政府宣稱：凡是蘇聯健全的公民，不管男性與女性，均能馬上找到工作，這工作是他們能力所及的生產事業，或是暫時受嚴格的訓練，準備成爲熟練的工人，以應迫切的無限的需要。或許有人以爲蘇聯的沒有失業乃由於法律上的強迫勞動，其實這一點是錯誤的。

在礦山或工廠中的工人，往往因對工作，食料或寄宿的地方表示不滿，或聽聞別處的待遇較佳，便成羣結隊地離開工作區。到蘇聯去遊歷的外人，常常可以看見工人羣衆的移動，並聽到工廠監督們對於工人漂浪的怨言。在蘇聯境內，到處有勞動力慢性缺乏的現象，不僅限於熟練工人，即非熟練工人，也感到缺乏。

現在，我們可以討論到最重要的一點了，蘇聯的經濟制度已發現了全世界摸索着的經濟秘密，就是說，生產與分配權，不交給生產者——資本家或職業組合會，而交給代表消費者的集團——屬於政府的或合作社的。生產企業的指導權必須操在不以營利

爲目標的消費者的手中時，才能熱心地專注於生產的增加與價格的遞減。只有消費者自行操縱着管轄權時，才能避免膨脹與衰落的交流。而且，只有消費者的集團自行措理生產與分配的整個問題時，全體勞動者的生活才能獲得保障，才能不感到週期的普遍的失業痛苦。這失業並非僅僅職業組合主義所能消滅的。

隨着生活程度的繼續增高，每年消費者的需要將超過生產者的生產量。由於天然力的高度使用以及機械力的不斷發展，每人的生產量也同樣增加。生產量的增加的另一方面，就是工資的增加；因爲工資的增加，對於商品與事務的需要，也隨着增加起來了。這樣，據蘇聯共產黨的意見，消費者的需要是沒有限制的。

誠然，當一個人足衣足食時，他需要更大的住宅，更好的衣着。當一個人對一切物質享受到膩煩時，他需要更多的劇院，音樂會，假期俱樂部以及修養學問的機會。假使各方已經達到了飽滿狀態時，則又需要更多的閒暇，更長的假期，使國外旅行成爲大衆的而非特殊階級的權利。

總而言之。蘇聯的共產主義者是這樣主張着：站在平等的基點上，以有計劃的生產組織去維持全人口的生計，完全消滅剩餘價值即利潤的攫取。不論在目前及將來，生產分配管轄權，完全由代表消費者的集團去操縱，永遠不會發生不自然的失業現象。這主張全世界實值得加以嚴重的注意。

三 蘇聯的勞動狀況

關於蘇聯的一切正面論斷，最難使人確信的要算關於勞動者狀況的敘述。挾着不同偏見的觀察，固執地集中注意力於不同事實的選擇，因此所得的結論也互相差異。其實，蘇聯的種種事態，必須要用新的眼光加以觀察，向來慣用的範疇是不能適合的。

蘇聯從事於物質生產的男女勞動者，概括地可分為四類。第一，是屬於農村家族的八百萬農民，他們仍然是個別地工作着，不僱用外面的勞動力，對政府負累進稅的責任，享有自己勞動力的收穫的全部。第二，是歸併於集合農場的一千六百萬農民。有幾處的集合農場，已經完全演進到共產集居的階段（Commune）。不過，一般講來，集合農場裏的農民大都在政府幫助之下，對穀類的播種收穫，共同工作，至園藝出產，家畜，牛酪等，則仍

係私有。第三，是屬於各種製造業協會的二百萬至三百萬手工工人。他們集合若干人爲一團體，自己管理工場，使用機械電力，所有出品，均售與政府或消費合作社。至以漁獵爲職業的獨立生活者，也包括在內。第四，是屬於佔蘇聯全人口四分之一的薪給勞動者。他們工作的範圍是農場，礦山，工廠，輪船，鐵路，電氣，國營的（分中央與地方）企業機關，以及消費合作社的企業機關。一般人所欲調查的蘇聯勞動者狀況，就是指這一種工人，本文所述也專注於這一種工人。

所謂勞動者狀況的意義，乃指勞動者在他們所處的社會中的收入，地位與組織而言。蘇聯是實行論件制的，工人每月的收入，由五十盧布至五百盧布不等，不過這些盧布實際上值多少元或多少鎊，則無從確定。因爲，蘇聯城市中的商品價格與房租完全以個人的地位爲標準，就是說，要看主顧的職業是什麼，每月收入有多少，所往來的店家與餐館的性質怎樣。倘使有了錢而買不到東西，則錢就失掉它的用處，而且在市場上，有許多需要的商品，常常是缺乏的。於是，這就要依靠個人能夠屬於特殊的合作社或工廠膳堂

來補救這缺憾了。再者，蘇聯工人的酬報並非限於月薪一項，每一個工人的房租規定，照工資的十分之一計算。他不須負擔自己的與子女的教育費，也不須負擔全家的醫藥費（包括住院療養，所用的藥品，請假期間，工資照給。）工人的妻子如在工廠做工，分娩前後八個星期的工資全部照給，產時看護完全免費，此外尚有各種社會事業，工人可以無代價地享受。

在實際生活方面，一九三二年的蘇聯工人狀況，平均地講起來，似已確較一九一四年的工人狀況改進不少，衣食住的供給均逐步向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蘇聯的全部工人，在最近的兩年間，不感受到失業的痛苦，這點遠非英國、美國或德國的工人所能冀及。自然，最能瞭解蘇聯狀況的人，同時也覺得蘇聯工人的生活水準，差不多在一切物質享受方面，與英國或美國同級的，微俸未曾失業的工人比較，依然相形見拙。

工人的地位與組織，尤值得去檢討。蘇聯的工人被環境促成一種真實的感覺，那就是：工人階級佔有一切，工人階級決定一切。在莫斯科，卡柯夫（Khar'kov）或洛斯托夫

(Postor) 的街道上，在歌劇院戲院，電影院或公園中，絡繹不斷地麤集着衣履整潔的工人，在尋求娛樂或從事運動，任何觀察者恐怕會不自覺地，默默地假定他們確是佔有一切，決定一切的人類吧。其他各國以為是優秀的階級，在蘇聯似乎是不存在的樣子。倘然如涅戈鮑戈 (Knicorbocker) 的觀察，奴隸制度是一般的條件，那末，至少現在蘇聯的工人已相信他們是主人了。

工人的特殊組織是職業組合。蘇聯的職業組合有一千二百萬會員，幾佔合格工人的四分之三，至非組合員大都為季節工人 Seasonal Workers 或剛由農村中出來的農民，全世界的職業組合沒有像蘇聯那樣的發展，那樣的有重大性了。而蘇聯的職業組合主義，不論在結構上或機能上，與各國的職業組合包含本質的差異，這差異，據蘇聯當局的意見，足以表現職業組合發展過程中的較高階段。美國或西歐各國的職業組合，主要是工人階級的反抗集團，至少是對資本家慢性的敵對力量，實行不斷的經濟鬥爭的集團。但在蘇聯，因為資本家實際已被消滅，職業組合已發展為管理機關了。

所以，我們如欲瞭解蘇聯的職業組合主義，必須放棄慣例。蘇聯沒有像英國或美國的舊式職業組合。舊式的組合是根基於會員的特殊行業，排斥該行業以外的一切工人——不論在同一工業或同一工廠中的工人——完全關切於會員與行業狀況的維持或改進，唯一注意於會員與同業間利益的獲取，對於國家集合財富的生產，對於他們所工作着的整個企業的經濟效率，組合的會員是毫不加以注意的。

現在蘇聯的一切薪給勞動者，組成四十六種龐大的職業組合。伸展到蘇聯的各部。一個人加入一種組合。至於他的等級或行業，體力勞動還是精神勞動，酬報的特殊方法或酬報的總額，性別，年齡，種族以及信仰，一律無關重要。在一個實業，教育，醫藥或任何機關工作的人，僅能加入與他的工作機關發生最大關係的職業組合。普通照收入的百分之二繳付會費。試舉史丹林堡拖曳機廠為例，不但各門工人與機械師須加入機械製造職業組合，就是廠裏的總經理，經理助手，監工，製圖者，打樣師，事務員，簿記員，廠醫，看護，清潔夫，管門人，挑夫，信差，不熟練工人，醫院，酒排間職員，以及男女練習生，均須加入同一的

組合。倘使任何工人或職員脫離拖曳機廠，往國營農場或醫院去工作，同時他就脫離機械製造職業組合，加入農業組合，或醫業組合。

這樣，使每一個勞動者同他的工作機關，併為一體，使每一個被雇用者的利害觀念，不集中於個人的特殊成就，而着眼於他的工作機關，對整個的社會集團到底有怎樣的貢獻，使他瞭解並非個人生產財富，乃為共同生產，上自經理，下至練習生，均為生產而互相合作。

蘇聯四十六種職業組合的下層結構是所謂店務會議 (Shop Meeting)，店務會議實際是天天會而共同工作者的會商，這會議，有時包括一個工場，一個小工廠，有時包括一個大工廠的特殊部門（經理職員辦公室亦在其內），有時包括整個企業機關，有時則包括企業機關的特殊部門。這些下層組織常常舉行公開會議，討論業務，或選舉出席廠務會議 (Factory of Institute Council) 的代表。廠務會議代表大工廠或大機關的一切下層組織，普通有委員十二人，按照規定日期開會討論業務，並選派代表出席縣區

會議 (District Conference)。縣區會議是代表指定區域內同樣性質的各工廠或各機關。在縣區會議上面，還有省區會議 (Provincial Section)。

每一職業組合的階級層，恰如蘇維埃制一樣，每一級的職業組合有一個執行委員會，一個主席團，一個主席與一個書記。四十六種職業組合中的每種組合的最高執行機關是代表大會，有中央委員會及尋常的主席團，代表全蘇維埃數千萬的會員。四十六種職業組合中的每個中央委員會選派代表，組織全蘇維埃職業組合代表大會。蘇聯的最高當局如『國家最高經濟議會』 (The Supreme Council of National Economy) 以及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凡欲解決國家實業的進行，或決定四十六種職業組合會員的工作及工資率等重大問題，必須要同全蘇維埃職業組合代表大會相磋商——大抵與它的主席團或執行委員相磋商。

蘇聯職業組合的工作與錯綜複雜的組織層，同各國的職業組合運動比較起來，顯然有很大的差異與進展。蘇聯的職業組合不僅要顧到各個會員的切身問題，如論件率，

工廠爭端，食料，住宿，特殊部門職工的週期的增減等，還要管理各種社會保險，會員療養室，假期休息室，工廠膳堂，調查並督察工廠與礦山的安全，管理會員俱樂部，圖書館與教育班，安排在休假中會員享受的權利，分配歌舞蹈，劇場，音樂會或電影院的廉價票等。

關於工資方面，職業組合的下層組織僅指理使論時制變為論件制，中間層組織則與經理及專家簽訂合同，規定他們的工資，至最高層組織方始指理論時工作率的修改與遞增。如任何工廠發生爭端，則廠方派出代表與當地職業組合的書記及共產黨部代表磋商解決的辦法。因為仲裁機關的完備，蘇聯不會發生罷工的事情。

全蘇維埃職業組合代表大會，每年至少舉行會議一次，這會議最重大的任務是關於再生產的與消費的生產總額的區別。所謂再生產部份即指修理，維持，添置機械房屋等，在生產總額中，一部份是分配到集合的公共事業上，如教育，衛生，社會保險，文化及娛樂等。其餘可以消費的商品則作為工資的基金，完全分配給用體力的或腦力的薪給勞動者，中間沒有剝削的存在。

自然，最要緊的一點在決定分配的計劃。由我已往十年間的試驗與經濟教訓，蘇聯負責的領袖們，在普遍的贊助下已一致同意於一種分配計劃。蘇聯每年採行這一種計劃，除細微的更動以及每年生產額的增加外，沒有別的特殊變化。

蘇聯的職業組合，採取工作等級制，從最年青最不熟練的到最有經驗最專門的勞動者，大概分爲八級。等級的形成，根基於工作的『社會重要性』。最低級的工資率，則按照生活水準而規定。全蘇維埃一切企業的最低工資率差不多是相同的。

蘇聯的勞動者只有工資上的等級，而沒有身份上的等級。因爲各種職業的同一等級的工資相等，所以能夠避免一切劃分界限的爭執，也不會因工資差異，彼此懷着嫉妒的意念。全蘇維埃職業組合中央委員會，與各個職業組合的中央委員會及『國家最高經濟議會』的主席團磋商之後，規定各個等級的工資，最高級的工資大概超過最低級的工資三四倍。輕工業的最低工資，每小時爲一盧布半至兩盧布之間。

在許多地方，工人可以自己規定他們的等級。任何工人可以在無論什麼時候請

求升級，只要他能夠表顯他的才幹，使夥伴與工廠的經理部認為滿意。對不熟練與低級的工人，給予種種鼓勵與幫助，提高他們的資格。莫斯科有一家大工廠，僱用一萬工人，根據去年夏天的記錄，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均免費入夜校。工人知道，生活的向上全靠他們自己掙扎，他們必須同心合作，提高生產效率，減低成本與消耗；第二，他們必須加緊工作。

每一級的標準工資，在可能的情形之下，均改換為論件率，現在蘇聯百分之七十五至百分之九十的勞動者已照論件率計算工資。勞動者獲得勞力的全部代價，這是一種很公平正直的制度。以前生產數量定為標準額，如超過標準額一倍，則所得工資也超過尋常論時制的工資一倍，有的時候，且超過一倍以上。因有沒有榨取利潤的雇主，所以沒有減削論件率的危險與恐懼。

蘇聯的職業組合主義，不僅是增加生產，並且是減輕成本的一個絕大的要素，在英國與美國的雇主們看來，這似乎是一個矛盾，但我們現在却可以瞭解了。蘇聯的職業組合主義並非與雇主們挑戰，而是向整個的生產者集團挑戰，這在生產的成功與增加上

是必要的。

所以，蘇聯的勞動者均非常願意接受論件率，組織最好的集團，裝置效率最高的機械。所以，蘇聯的勞動者具有普遍的熱忱，要去受實際的訓練，要去使一切勞動者成爲非常熟練的工人。所以，蘇聯的勞動者均養成遵守秩序與時間的意向，避免消耗與浪費。所以，蘇聯的勞動者自動地組織突擊隊，去清理落後企業的未了工作，去加速每個工廠的生產，追上五年計劃的標準額。所以，蘇聯的勞動者自動地參加社會競賽，在規定的時期內，比賽生產的增加與成本的減輕。

蘇聯的產業當局說，生產繼續不斷的增加大部份當歸功於工人的力量。的確，自有史以來，俄國鄉村中的農民，渾噩而無能，要完全克服他們的意識，使他們成爲集團的生產者，在各國觀察者的眼光中，均信爲不可能。然而，蘇聯在這一點上却成功了。

蘇聯的各級勞動者，對實業管理上的任何事件，均大膽地公然地加以無限制的討論與不斷的批評，被聘任的外國專家們對這一點常常表示不滿，但共產主義者的意見，

則以為普遍的自由的討論並非障礙，而是一種優點，最後有利於國家效能的遞進。倘使薪給勞動者均不准發表意見與批評，實行經理獨裁制，則特殊的雇主將毫無忌憚，甚至增加他個人的利潤，要使各等級各部份的勞動者的目標一致，力量集中，最好的方法只有使他們普遍地參加負責的生產組織。至少他們要能夠自由討論，坦白批評。蘇聯的共產主義者對產業上的德模克拉西，不僅相信它有教育上的價值，並且相信它的個人生產效率的優越性，因為在這狀態之下，代表管理者與勞動者的兩方面，對於工作的劃分，工資的增減等，均永續地為整個生產而互爭長短，不甘落後。這一點，誰也不能加以非難，不過，必須私人企業家及榨取者完全消滅，方能達到這境地。

蘇聯的勞動者，除了在物質方面，超過歐戰以前的享受外，在教育與文化方面，也有了鉅大的進展。他們在歐戰以前是目不識丁，愚蠢無知，污穢齷齪，酗酒成性，淫蕩好色，不守規則，不遵時間，在俄皇時代昏庸無能的他們，誰也不會相信能夠成為幹練勝任的工人。可是，現在蘇聯各城市中的工廠勞動者平均所看的書，已經比英國或美國工人所看

的爲多；他們規則地，準時地工作着；他們的衣服，在清潔與質料上，均好了許多；他們是劇場，歌舞團及電影院的老主顧；他們在技巧上或許還趕不上德國工人，但他們在實際效能上已有驚人的進展。在過去十年間，蘇聯在城市所建築的房屋，要較全世界任何城市爲多，但住宅狀況，仍擁擠不堪。

總而言之，蘇聯城市勞動者的地位，在過去十年間所改善的程度，實非全世界任何一國的勞動者所能企及。

四 蘇維埃統治下的自由

現在，我們仍然可以聽到沒有去過蘇聯的人們這樣說：蘇聯的制度是屈服與奴隸的制度。可是，洛相爵士（Lord Lothian）自一九三一年偕蕭百納與阿斯多爵士夫婦（Lord and Lady Astor）遊莫斯科回國後，却對人家說，蘇聯所經過的事實，不是單純的法國革命，而是文藝復興與宗教革命的綜合，質言之，是人類的大解放。事實到底怎樣呢？

蘇聯的人民不但看上去不像奴隸，就是講話也沒有奴隸的神氣。如果你在蘇聯遊歷的話，你將目觀城市中的街道，劇場，電影院，擠滿了男的女的，在人烟稠密的唐納次（Donetz）礦區與工廠區，青年人騎着腳踏車沿途來往，在國家農場的俱樂部裏，更是一羣羣地簇擁着。你會相信他們是被奴役着的人民嗎？如果你是永遠在擁擠着火車上，或

是在伏爾加河汽船上，與搭客們閒談，如果你和莫斯科以外的職業組合或消費合作社的會員有討論的機會，他們也公然地對政府發出怨言，同各國的人民一樣。蘇聯的工人即使在機密的談話中，也從沒有表示過屈服與奴隸的意思。

但蘇聯與各國的人民確有一個重大差異點。在過去兩年間，蘇聯的人民不知道有失業一回事，除他們自己要變換工作之外，沒有失業的恐慌。他們對於英國與美國工人的不能自由工作，非常同情。

目前蘇聯各種主要的企業，尤其是新的企業，均深切地感到勞動力的繼續變動的痛苦。到處工人的流動性非常利害，實際上，他們並不受工作的桎梏。一個新工廠每天平均有一百個人脫離工作，往別處去找事做，這是很平常的。試舉契里平斯克地方拖曳機廠為例，在一九三二年六月的前十天中，雖然僱用了二千一百八十八個新工，但在同時期間脫離該廠的也有一千零二十七人之多。

蘇聯的法律並無禁止放棄工作的條文，而且這也是不合理的。因為在發展過程中

的蘇聯各城市，難免有種種的不便利與不安定，假使工人聽到別的地方有空的位置，有較多的食物與較為寬敞的住宅，他們自然容易信以為真，情願投奔到那裏去。

八千至一萬的國營企業機關的經理，均拚命地招募額外工人。即使是招募非熟練的工人，也不能夠完全滿足需要。至熟練工人，則幾乎常常感到缺乏，致經理們不得不用種種引誘的方法，去偷挖工人，這方法已被蘇聯當局禁止採用。蘇聯當局有時也將工廠中的半熟練工人，拉攏到新工廠中去工作。因為這個緣故，史丹林堡拖曳機廠的廠長特與當局訂立契約，每月由該廠挑選若干半熟練工人，送往他廠工作，政府方面不得向該廠再有所要求。

放棄原來的工作，而流蕩到別的地去尋求比較舒適的待遇，在蘇聯，這並非新奇的事。無論在什麼時候，如果耳聞什麼遼遠地方的情形較優，蘇聯的農民就會跑到那裏去。這樣的流動性無疑地是經濟上的一種疾病，所有蘇聯的企業，均感受到同樣的痛苦，從流動性的普遍一點上，至少可以反證一般英國人與美國人說蘇聯的薪給勞動者是

奴隸的謬見了。自然，我們也不能說蘇聯沒有抑制，但抑制的性質與奴役勞動者的性質完全不同，關於這一點，我將在後面討論。

蘇聯革命所給予勞動者的解放，不僅物質的生活程度之提高。他們的思想，力量與野心，也同樣的提高。現在蘇聯各種企業的工資合同上所規定的新條件，實在是解放勞動者的強烈興奮劑，使他們能夠擺脫狹窄的樊籠，而為各國的薪給勞動者所夢想不到。每一個壯年工人，（蘇聯工人的年齡，差不多均在四十之下。）都瞭解地位的提高，全靠自己的努力。社會不僅鼓勵他，並且幫助他去遞升他的工作等級，增加工作速率與論件工資的收入。如果他要升級，隨時可以請求。如果他在高一級的地位工作，能使經理部滿意，就可以繼續工作下去，至於他會否經過適當的學習，則無關重要，也沒有劃分鴻溝的其它困難。這是實際的解放，美國與西歐各國皆有望塵莫及之概。

尤足引人注意的，是蘇聯工人對於批評的自由，幾乎到不可思議的程度。我們知道英國與法國工人可以自由地咒詛政府的原則或主義，可以評蔑行政官吏的行為，但他

們對於工廠的管理，對於工廠的股東，經理以及監工們，則不得加以任何批評與怨詈。蘇聯的情形却是相反。蘇聯的工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願如何批評，對於『史太林同志』不願加以咒詛，對於共產主義政府的設施，也不願有所懷疑，因為他們恐怕會因此獲得反革命的頭銜而常常受警察的監視。可是，蘇聯的工人可以毫無顧忌地批評工廠的設施與工作，甚至辱罵他們的經理與監工，可以在壁報上大膽調笑諷刺他們的上司。他們在實際上要較英國或美國的工人自由許多。在一九一七年以後，所有從美國回到蘇聯的人均承認這一點。

十月革命給予婦女，兒童以及少年的解放，格外來得明顯。二十年前的俄國婦女，倘使不是孤孀的話，不能自由地措置他們自己的生命與身體。在大多數的家庭中，女兒們沒有讀書寫字的機會，除了結婚外，只能可憐地依賴着父母。而且，他們也不能怎樣自主地選擇他們的丈夫。出嫁之後，她們便要服從丈夫的意志，終身要依賴丈夫。

可是，今日的蘇聯婦女却毫不受性別的束縛，要較任何一國的婦女自由了。女性的

文盲，同男性一樣，已急速地消除，滿了十八歲就成爲完全的公民，有平等的被選舉權，不僅各種職業組合與消費合作運動，沒有性別的歧視，不論在那一方面，她們所受的待遇均同男性一樣。講到婚姻關係，夫妻間也是平等的，對於離婚，夫或妻有同樣的自由與同樣的義務。爲避免母性生理上的障礙起見，工廠方面非常注意醫學設備，勞動婦女得免費住院，在生產前後，有八個星期的休假，工資照給。（如係用腦力的職業婦女如書記等，則爲六星期。）撫育嬰孩，工廠有規定的時間，並且還設備着托兒所，使母親們不致過份地疲勞。

在蘇聯遊歷的人，到處可以看見婦女們在機械廠做着同男性一樣煩重的工作，商船上的水手與無線電收發員，做國家農場或集合農場上的拖曳機駕駛者，從電報到外交，從速記到醫藥的一切事業與職業中，都有婦女的踪跡，有時她們的地位很高。倘使我們不能從質的方面去測量她們的工作，但無論如何，現在蘇聯女作家，女音樂家，女伶，女歌舞家的數量，較十年前是大大地增加了。

兒童與少年也得到同樣的解放。普遍地設立着的學校使他們不致成爲文盲，同時，學校展開一個新的天地。蘇聯的學校幾乎是狂熱地追求新時代，一方面摒除賞罰，一方面實行各種自治的方策。在學校外面，他們被組織成偉大的集團，五歲到十歲的集團稱十月團(Octoberists)，十歲到十七歲的集團稱爲先鋒團(Pioneers)，十七歲到二十五歲的集團稱爲列寧主義青年團(Comsomols)。每一個集團伸展到蘇聯的全境，有男女團員六百萬至七百萬，有無數的委員會開會討論事務的管理與進行。

列寧主義青年團，由七萬個細胞組織所構成，不斷地召集會議討論一切事務，他們自己設立圖書館，發刊新聞紙，銷路頗廣。他們對於書籍的購買量也異常鉅大，超過英德青年們的購買量不少。尤足使人注意的，是行爲的普遍規則之發展，在他們中間，逐漸形成一種嚴格主義，鍛鍊充實的生產的生命；譬如在衛生方面，養成開窗與冷水浴等的習慣，在運動方面，則禁止西歐所流行的性的舞蹈。在青年團員間，對於酒精與煙草的嗜好，或爲性的鬥爭而浪費時間與精力，均引爲不良習慣。「自我上進」已成爲一種流行

熱，各人努力於學術的研究，以提高工作的資格。

撇開成人以上的男性公民，單就一萬二千萬的蘇聯婦女，兒童與少年來講，他們在過去十五年間所得到生命上的自由，實為全世界在這樣短促期間所難企及。就是文藝復興與宗教革命的浪潮，也未能影響到如此廣大的羣衆的生命呵。

蘇聯人民的解放，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徵。現在蘇聯的廣大羣衆，已突然成爲貪婪的閱讀者。蘇聯現在刊行的新聞紙，每日的與每週的共計六百種，採用各種文字，總銷數已達一千萬份，這較革命前已增加了四倍。有幾種超過一百萬份銷數的新聞紙，每天用飛機派送報紙到全境的定戶。至定期刊物則可向各郵局購取。月刊與季刊趨向專門化，總計一千三百種，銷數一千萬份。

蘇聯在書籍方面的出版數目，尤超過一切。蘇聯的最大出版機關莫斯科出版部，在最近一年間出版的書籍計二萬四千五百冊，這個數目僅佔蘇聯總出版額之半，不過已非英國、德國或美國的總出版額所及了。據一九三一年的記錄，科學或哲學叢書的第一

版，平均爲一萬一千六百冊，政治經濟的科學書爲五十萬冊；大衆文藝如初學入門與綱領等等爲十萬四千冊。史太林的演說則須印刷二百萬冊之多。因此各出版機關均鬧着紙荒，不得不加以限制。而且，一經出版，即行售罄。所有各職業組合或各消費合作社的支部，各教育機關，各俱樂部，各青年團，均設立圖書館，去適應各範圍內的閱讀者的需要。關於這一點，當在『蘇聯的出版事業』一文中，詳細述及。

現在，我們可以討論到抑制的一面了。不過，所謂抑制，並非由法律或警察對於個人行爲的禁止上顯露出來，更非對於社會習尚的束縛而言，因爲如衣服習慣，消費程度，宗教儀式，職業等級，以及其他，蘇聯的人民實較各國的人民爲自由。抑制的意義到底是怎樣的呢？蘇聯每一個健全的成年人，必須工作，去維持他個人的社會生活。雖然蘇聯並不明令禁止靠公債或國家儲蓄銀行的利潤而生活的寄生階級，但寄生階級的存在僅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在實際上，這樣的寄生階級將受嚴酷的制裁，受苛重的捐稅，甚至不得享受特權，不得爲任何職業組合或消費合作社的會員，要出高價去購買商品，有的時候，

市場上的商品甚至告乏。爲摒除不工作而生活的寄生階級起見，政府嚴格禁止商品與證券的投機，與勞動力的榨取。其實，蘇聯的人民如欲獨自經營一種事業，僱用助手，攫取利潤，其困難的程度正同英國的人民要經營一個私人郵局一樣。

還有一點成爲時人攻擊的目標，就是所謂強迫勞動。強迫勞動有時是指監獄勞動，即加於犯人身上的一種工作，不過這懲罰的自身並不違悖國際強迫勞動法，似乎並無可以異議的地方。而且，蘇聯沒有把犯人出租給包工頭，爲私人生產利潤的事情，不幸這在美國與西歐各國却依然存在。蘇聯利用犯人的勞動力，從事於經濟上的生產，我們也不能嚴酷地加以指摘，因爲蘇聯並不爲奪取利潤而削價競賣或減低工資。有人說蘇聯利用犯人製造輸出的商品，蘇聯的政府已經明確地否認。按事實講，犯人的生產力，與蘇聯的總生產相衡量，與蘇聯的總輸出額相比較，實在是微乎其微，在經濟上實無足輕重。

強迫勞動的反對論者，或許並非指加於犯人身上的工作，而是指法律上規定的強迫勞動，像法國的人民有修築道路的義務一樣。在蘇聯的若干森林區內，大部份的成年

男子均在木材營中工作，倘使木料工人職業組合與政府的管理機關決定了要僱用多少工人，給多少工資，則附近的村議會必保證派出所需要的工人。雖然村議會並不強制任何個人，但公意強於一切。這一種僱用工人的方法已成爲習慣，所以，我們似乎也不能簡截地說它是強迫勞動。

其實，蘇聯的所謂強迫勞動，乃指經濟上的意義，即一個人必須工作，才得維持他的生命。蘇聯的強迫與各國的強迫又有不同之點，前者適用於整個的健全人口，後者則僅適用於佔全人口五分之四的無產大衆。但這經濟上的強迫勞動，在一種情形之下，却形成嚴重的壓迫方法。我們知道，蘇聯因爲勞動者的相對的稀少，個人對於職業的選擇，比較地有廣大的，實際的自由。可是，倘使有人被放逐到遼遠的地帶，那裏只有一種或兩種的工作可做，而被放逐者的生理狀態又不適宜於那種工作的話，那末，放逐無異是最苛毒的懲罰，甚至將縮短他的生命過程了。

在俄皇時代，許多政治犯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在一九三一年，許多富農被放逐到蘇

聯北部的森林區。他們的所以被放逐，是爲了他們屬於富農階級（Kulaks）。他們既然到了那兒，就不得不入木材營去工作，以維持生命。富農的財產被沒收後，有的去幹建築鐵路的苦役，有的最後屯居於荒地，成爲特殊的集合農場的會員。如果這一切傳聞是真實的話，則我們不得不說它是一種殘暴的壓抑。

然而，上面所講的關於蘇聯政府的抑制與壓迫，還不是最嚴重的。蘇聯政府被攻擊得最利害的一點，乃在於它是智識方面的獨霸的，偏執的暴君，在它的範圍以內，它不能容忍競爭勢力的存在。也不能容忍思想對立的集團。對於言辭與文章，警惕地防禦反革命意識的侵入，不論地位的高低，一律在廣佈的偵探網的籠罩之下，受着同樣的壓抑。據說，就是在今日，也有不經公開審訊與報紙記載，便被判監禁，或放逐到度日艱難的地帶，甚至有不通知親友，便秘密執行死刑的。這些到底有多少真實性，誰也不能肯定，不過，已往數年間，蘇聯確有這類事情發生，或許不若謠傳之甚吧了。

在動蕩的革命時期中，必然地會發生暴行，殘虐以及各種的罪惡，所以一般人要避

免革命，蘇聯雖然已經過了革命時期，但現在是否仍採用革命時期的非常手段，蘇聯的當局並不設法去解除一般人的疑竇。今日在蘇聯遊歷的人，均不免有這樣一種印象；雖然蘇聯的人民對於行政與設施的各點上，可以盡量地批評，一些也不受什麼桎梏，但他們就是在機密的談話中，也不敢表示在根本上反對共產主義的政府，不敢懷疑到未來的失敗，更不敢表示對於議會政治與榨取利潤的喜悅。不管是思想家或著作家，理論家或實行家，對於這種抑制並無反抗，或許他們不敢反抗吧。可是，如果與他們的交往稍久，就可以顯明地感覺到他們不僅在言語上有所束縛，而在思想上也嚴重地受着箝制。

大概我們都相信，思想與言論的不自由，不僅減少人生的快樂，最後的結果，將使社會集團的本身，受到嚴重的損失。思想家必須要能夠自由地思想，方能有偉大的、充實的貢獻。因為思想的抑制，除了壓迫如日本政府所稱的『危險思想』外，將阻遏新思想的誕生，這新思想對社會之演進是必需的。壓抑思想對於整個社會的損失的嚴重性，實難加以揣測。倘壓抑思想的結果，僅保持政府的權威，而失掉政府的靈魂，那末，壓抑思想對

整個的國家，又有什麼好處呢？

蘇聯的辯護者說這是戰爭性發展的結果，因為仍然覺得有被攻擊的危險，所以必須採用一切手段，去鞏固它的基礎，不致有被摧毀的恐懼，如果這情形是確實的話，那簡直是整個國家的災殃，蘇聯政府必須設法去克服它。

蘇聯政府的箝制思想與言論的自由，在上面已經說過了。而蘇聯政府在執行它的意旨一點上，也似乎頗有專橫與不平的地方。已往的富農階級如正教徒，地主及榨取勞動力的雇主們，或有被肅清的必要，因為倘使整個階級繼續進行足以危害大眾的行為，則剷除整個階級是大眾的權力與責任。但政治上的經驗告訴我們，倘使對於足以危害國家的階級施行整個的剷除，則對於階級的個人，不免有專橫與不平的待遇，這在社會自身是一種明確的損傷。

倘然英國有剷除任何階級的必要時，情形一定是這樣的：（一）命令的執行決非由於當地的紛亂的『羣衆裁判』（Mob Justice），必經過高級司法機關的詢查；（二）凡在

被肅清範圍內的份子，有充分的辯護機會，使「肅清」的行爲僅限於有被肅清之必要的份子；（三）放逐或其他罪罰的執行，必須經過法庭的公開審訊與判決；（四）如因體力關係不能做某項工作時，將給予憐憫的通融。這在英國人看來是出於人情與公平。

在一般英國人或美國人心目中，以爲蘇聯的統治是壓迫的抑制的統治，因此他們忽視了蘇聯統治下最重要的一面。他們忽略了蘇聯爲什麼在思想上要施行壓迫的與抑制的統治。蘇聯的政府爲國家的智力的，道德的，經濟的發展打算，絕對相信須建設有計劃的環境，因此對人民操着絕大的權威。蘇聯的政府相信，倘然沒有整個的計劃，着眼於全人口的活動力，則數千百萬的羣衆不能從目不識丁的，污穢齷齪的，罪惡的，災眚的，窮苦的深淵中解放出來。財富的生產不增加，生活程度不能普遍地提高，智力的與道德的進展也就不能實現。所以必須將無產階級或貧農所隸屬的環境轉變過來。所謂轉變環境，即將有計劃的環境去代替迷信的，魔術的，僅僅依附於天然財富的環境。所謂有計劃的環境，對小我的欲望，意旨，目標與活動，將加以廣大的，繼續的干預。

但這干預並無減損集體的自由之意。環境的自身限制個人的自由，不管它是有計劃的，或是無計劃的。讀過特萊賽的『美國之悲劇』(Dreiser's American Tragedy)的人，大概可以瞭解書中的青年主人公是一個完全無計劃的環境之產物，他——主人公——較處在有計劃的環境中向求解放與自由的蘇聯青年，要自由得許多，可是他卻不能自由地逃避道德的墮落與電椅的死刑呢。所以，我們不該受一切術語的迷惑。

我們仔細觀察，個別的美國人或英國人也一樣受富於壓抑性的環境之支配。事實上，蘇聯的政府以為如果把人民的環境審慎地計劃起來，則新的環境將使他的生命自由大大地充實。所謂有計劃的與無計劃的環境之基要的不同點，即前者對於整個的人民之全體，一視同仁，而後者却無力強制資產階級與自由職業者階級。

列甯曾經這樣說過：『自由是非常寶貴的，必須合理地分配給每一個人。』簡而言之，這可以說明蘇聯所厲行的事實上近乎獨裁的五年計劃。

五 蘇聯是不是民主政體？

蘇聯是不是民主政體？這是關於蘇聯政府的一切批評的基本問題，也是英美人要瞭解蘇聯在經濟建設上能夠成功的要點。我們必須知道，我們的一般的思想範疇，是不能夠適用到這一個問題上來的，我們如果僅僅說：蘇聯的政體與美國不同，與不列顛帝國也不同，這樣，我們對蘇聯的特殊政體，將無從發生真確的認識與評價。

蘇聯共產主義的思想家，對於蘇聯的憲法，與所謂「正統民主政體」的憲法，否認有任何相似點，但在實質上似乎是相通的。譬如說，一個國家的事情，應該根據一國人民的意旨去管理，這一點，蘇聯的思想家大概會同意的。再譬如說，倘人民覺得政府所頒佈的法律，已獲一致的擁戴，則社會將愈臻安定，行政的效率將格外增高，這一點，蘇聯的思想家大概也會同意的。更譬如說，民主政體的社會集團是建築於平等的原則上，並且飽

和着平等主義，這一點，儻然撇開了機械的組織不談，蘇聯的思想家大概也會同意的。關於以上三點的任何一點，蘇聯的共產主義者均毫不猶豫地自稱蘇聯是一個民主政體的社會集團，並且是現時代全世界中最完備的民主政體的社會集團。

但是，我們從政治組織的形式上，立刻可以分辨出蘇聯與各國的不同點，蘇聯有幾個並行的組織層，實際上採取着共同的形式，而不是由單獨的代表制度來操縱一切權力。蘇聯的公民僅僅在工人或鄉村的小集團間選舉他們所認識的人，從間接的選舉，代表他們的權力，而不是像各國數百萬的公民，在廣大的選舉區中，共同投票，選舉立法與行政的最高領袖。在蘇聯的廣大社會中，個人的財富對於政府，對於無線電播音，對於報紙宣傳，均沒有什麼用處。所以個人的財富對於選舉，毫無有什麼影響。但蘇聯的政府對於勞働的男女，給予各種便利，使他們參加政府的工作，而不是像各國的重要位置，均由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有密切關係的人物去充任。在西歐與美國，所謂民主政體可以說是普選與言論自由的總合的具體表現，在蘇聯總合地說起來，民主政體是關於公共事

業的不斷的論辯與普遍的參加。

現在我們站在這立場來觀察蘇聯的現行政制。第一點，我們必須認識蘇聯的共產主義，雖然盡量地擴展集體管理的範圍與功用，同時却極力避免以許多問題去攪擾投票人。試以最近的美國總統選舉為例，美國大多數選民到底爲什麼要投羅斯福的票，恐怕不能夠確切回答吧。蘇聯公民的投票，完全不是這樣的；不同的團體，在不同的日期，爲不同的範圍而分別舉行。譬如說，縣蘇維埃的選舉，由廣大的選民，各就其特殊的工作範圍，與各級的勞働者，舉行投票。在鄉村的選民，則普通與職業相同的鄰居共同選舉。蘇聯的公民獲得蘇維埃選舉權的，約有七千二百萬，同時因爲他們是消費者，所以也是四萬五千七百六十四個消費合作社的社員，（根據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的調查，）他們可以選舉管理委員會，統轄關於四分之三的日用品的分配。

第二點，蘇聯的公民，只要是成年的與健全的，都是參加生產的活動份子，所謂生產，不僅限於工業與農業，就是行政機關，交通運輸，銀行，社會事業與文化機關，一概包括在

內。這些體力勞働者與精神勞働者，組織四十六個龐大的職業組合，每一個組合對於政府，對於社會設施，有相互的，均等的參預權與管轄權。他們的選舉與蘇維埃或消費合作社的選舉，採取相似的形式，隸屬於同一生產機關的職業組合員集合起來，選舉他們的店務或廠務委員會。此外，非薪給勞働者及生產工具所有者，則組織生產者協會，選舉他們的地方委員會，管理他們的事業。

蘇聯繁複的選舉制，有三種不同的性質，即：（一）關於普通公民權的選舉，（二）關於日用品分配的選舉，（三）關於財富生產的選舉。這樣的選舉制使成年的公民格外有宣洩願望與重視公意的實際機會，決非英國的下院選舉或美國的總統選舉可比。現在蘇聯的公民，不僅投票的人數較各國為多，就是投票的機會，也超過各國。

蘇聯公民的參預政權，並非在投票之後就算終結，凡當選的蘇維埃，消費合作社，職業組合，或集合農場的代表，在他們的任期內，每隔數星期要在公開的會場上，對他們的投票者，報告工作的經過，解釋業務的進行，回答投票者所提出的疑問，並注意投票者關

於各種問題的意見與不滿。蘇聯境內，東自太平洋，西至波羅的海，成千成百的小集團的公開會議，繼續不停地在進行着，討論公共業務的推進，無論在那一個國家裏，我們看不到這樣的現象。而且，隨時隨地，投票者有絕對的權力，可以撤換他們所選舉的代表。這樣的選舉制度到底能不能稱爲民主的，我們可暫置不論，但研究政治的學者至少須認識蘇聯的選舉制度，使民衆對於公共事業，有廣大的參預範圍，並在改善社會環境的管

理上，給予全體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政治訓練的特殊價值。

蘇聯一萬六千萬人民的複雜的政治結構，均根據於成千成百的分組會議，採取間接選舉的便利方法，所有市議會，村議會，消費合作社，職業組合，以及製造者協會的各種委員會，除管理地方的事務外尚有選舉代表出席縣議會的重大功能，縣議會管理一縣的事務，並選舉代表出席省議會。這樣，各種系統的組織，並行不悖，各自形成一個最高的大會，代表屬於該組織的全蘇聯會員的整個利益，關於蘇維埃的組織，不僅像其它組織的選舉執行委員會，主席，主席團，書記，並且還委任人民委員，形成全國最高的行政機關。

在蘇維埃，消費合作社，職業組合，以及製造者協會的各級委員會之間，常常召集會議，磋商並討論一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與需要進行的事務。

根據蘇維埃的法規，不論是選舉或委任各級人員，如主席，書記，縣長，經理，事務員或工人，均不採取普選的方法，所有高級或低級官吏的選擇，常由執行委員會或主席團去決定，實際上這較英國的選舉還要普遍。工廠或其他企業機關的監督或經理普通有全權去選擇合格的職員。

現代溫和的或激進的社會主義者，尤其是前者，以為間接選舉將減損大眾的統治力，所以不贊成間接選舉；並且以為英國過去二百年間的經驗也似乎對間接選舉不利。可是，倘然我們有數萬萬廣大民衆的話，就是最忠實的民主主義者，也不免要懷疑到直接選舉的實效吧，如果我們更想到擁着百萬資產的證券交易的老闆，想到資產階級的報紙，無線電播音，想到統治階級的一切權威，那末，所謂民主政體——在陳舊的意義上，簡直將成爲滑稽的趣劇。蘇聯的選舉制度，不管我們說它是民主的也好，非民主的也好，

比較美國、英國或德國的選舉制度，却格外能夠真確地宣達民衆的意旨，這一點，我們很難加以駁斥。

蘇聯的各種組織層如蘇維埃，職業組合，消費合作社以及製造者協會，雖然在表面上是政府機關，但並非蘇聯的真正的政府機關，並不執行共產黨的一般的命令。蘇聯共產黨可以說是特殊的夥伴集團，使我們聯想起救世軍的軍官隊與羅馬時代天主教的宗教會，它不委任人民委員，也不委任政治警察的（OGPU）首腦，法官，縣長及其他受薪的行政官吏。它常常指出什麼事情應該要去幹，不論是重大的，或不重大的。但是它的自身除了勸導之外並無任何法律上的權限，這樣的集團，頗像實驗哲學家康德（Auguste Comte）百年前所稱的「國家的精神之力」。

今日研究蘇聯的學者，對於經過挑選的，嚴格訓練的及具備絕對的夥伴精神的共產黨員，大概可以確信他們在社會上的領袖地位了，一般人以為蘇聯的共產黨像美國或西歐各國的政黨，其實，這是十分錯誤的。共產黨員不是與民衆分離的特殊階級，共產

黨也不是一個與民衆分離的特殊政黨，蘇聯兩百萬的共產黨員與候補黨員，大多數仍然是各種生產集團的薪給勞動者，居於領袖的地位，受夥伴們的信任與服從，其餘的黨員，則大多數在地方或中央的執行機關，（包括消費合作社與職業組合）一天到晚地工作着。因為他們的被選擇是由於領袖才幹的合格，所以他們差不多都佔着行政機關與產業部門的重要位置，但無論在怎麼場合，他們須無條件地服從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上級的主要人員的命令。

所以，『史太林同志』雖然僅是共產黨的總書記，但他的地位與聲勢，却給世人普遍地認為一個獨裁者，不過，說史太林是獨裁者，只能在限制的意義上，方有它的真確性，因為史太林的命令，僅能束縛兩百萬黨員，並非一萬六千萬民衆的法律，也並非由警察或法院去強制執行，對於他的命令，人民委員與重要官吏雖必須設法去實現，但也只能盡勸導之責而已。我們更須明瞭，『史太林同志』的決斷並非就形成他的專制的命令，他實在不是這樣的人。據可靠的報告，克列姆林（Kremlin）宮中一切重大事件的進

行，都採取着小組委員會不斷的會議性質，而那種會議並非一定要他去做主席。據說史太林非常擅長於發出巧妙的問題與勸誘的申說，去轉移各個委員會的決議或結論。而且，凡是在報告上所看到的各方面的事實與輿論，他也有一種差不多可以說是神祕吸收量與消納力。基於綜合的材料，他按期發表意見書，有的時候僅用他個人的名義，有的時候則與蘇聯主席的名字列在一起。

我們現在不妨說蘇聯的憲法，在成年的公民對於公共事業有儘量參與的機會。所謂公共事業，包括計劃地統制着整個的社會環境，而普遍的直接選舉，則行施於組織的底層。所以在實際上，權力確由民衆而產生。如列寧所云：『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這權力經過間接選舉媒介，一級一級傳遞上去，在每一級發揮它的勢能，傳遞到組織層的頂點後，這權力便形成各種命令，決定怎樣去操縱集合的統制權。所以，外表上看來，蘇聯政府的權力是由上而下，像各國的政府一樣。

但是，倘使我們忽視了另一方面的特殊發展，我們也不能公允地批判，蘇聯這特殊

發展就是康德所預言的『一個國家的精神之力』，它是社會集團的基本的意旨，社會正義的明示，它常常以勸誘的方式去迫使政府。如果康德那時喜歡運用民主理論的話，也許他要這樣說：只有憑藉了『一個國家的精神之力』，社會集團才能繼續地表現它的意志，同時使這意志實現起來。

而且，我們討論蘇聯的憲法，僅僅說它是民主的或非民主的，那並無用處。我們要確切地瞭解蘇聯的憲法到底怎樣實行，就是說，它怎樣基於民衆的願望，統制社會環境，怎樣使普遍的自覺，便利立法與行政，怎樣使民衆獲得最善的平等。關於蘇聯憲法的最高度的批判，各國的學者將因他們的偏見與消息的歧異，永遠不能一致。但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一點：不論是側重於社會的平等，民衆願望的實踐，或贊助政府行動的普遍自覺，所有蘇聯的有思想的公民——不一定要共產黨員，均不承認英國、法國、美國或德國的憲法，比較他們的憲法，格外能夠接近於所謂民主政體。

講到這裏，則我們可以判別出蘇聯的集體組織與各國的一般組織的差異點及特

殊性了。不過，所謂差異點，並不在於國家的或民族的整個目標，美國憲法的創造者所努力的目標，同時也是列甯終身所奮鬥的目標，獲得人類生命自由，幸福的一切權利之平等。傑佛遜（Jefferson）以為只要肅清君主政體，及剷除束縛個人努力的法律，僅僅保存法院與警察，就可以使人類的一切權利，達到平等的境地。一百年前英國的過激主義者，一般地也贊助此說，後代人使之合理化，道德化，『自愛與愛人是一樣的』這句話，成為信條。就是說，倘使讓每一個人自由地追求他個人的利益，則一切人的利益，均自動地獲得保障，至少，除了讓每一個人各行其所好的方略外，沒有第二個實際的辦法。

這是產業革命以前的話，自從經過產業革命以後，四分之三的民衆便淪為無產的工銀勞動者，使極少數的資本家形成經濟上的獨裁。傑佛遜如果看到這情形，大概第一個要加以憤怒的。倘使我們說現在英國或美國的憲法，保障每一個人的生命，自由及幸福的一切權利之平等，那似乎近於滑稽。可是，蘇聯的大膽試驗却告訴全世界，那種實際的辦法確然格外接近於傑佛遜所努力的目標。

現在各產業國家的勞動大眾，而且是受着憲法保障的勞動大眾，均感受到壓迫與威脅的痛苦，在尋求保障。我們要明瞭痛苦的真相，須先明瞭威脅與壓迫的性質。各強國最大多數的民衆爲什麼在貧窮中生長着？爲什麼陷於慢性的困苦中？爲什麼勞動大眾的工資，不能夠維持適當的生活？不能夠充分教養他們的家庭？誰使工作最苦的勞動者，居留在最醜觀、最不衛生的環境裏，使他們的死亡率與疾病率，超過必需的限度以上；誰剝奪他們的閒暇、休假、旅行與教化的權利？誰使他們週期地遭遇不自然的失業、飢饉，使許多人老死於貧窮？我們的祖父輩或許說還是先天的罪孽，我們的父輩很安詳地把這些病症——雖然明知是社會的病症——歸咎於窮人自己的惰惰。

然而，蘇聯的完全合於現代科學的自覺，却把這些社會的病症，與一切幸運的不平等，歸納到經濟的環境裏去，因爲人必然地要在那種環境裏面生長的。英國與美國就是在不發生經濟恐慌的時候，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工人所得的工資，不能夠適當地維持他們的生活，但這並非因爲有君主政體，國家教堂，或奴隸產業的存在，也非因爲一個國家

的資源缺乏，也非僅僅因為統治階級的殘暴與奸惡，而是現實的環境，現實的社會組織，剝奪大眾的自由與享受幸福的平等機會。利潤生產的動機，具體地從一切生產工具私有上表現起來，釀成現社會的絕端化與痛苦的壓榨。

因此，蘇聯現在所要進行的，是審慎地，不斷地去形成整個經濟的與社會的新環境，使每一個人能夠真正獲得機會的平等，與最高度的個性發展，這是蘇聯建設計劃的目標與意義，是蘇聯一切政治的核心。每一年蘇聯當局統計着有多少成年的，健全的勞働者需要從事於生產的機會，（沒有別的國家能夠從這出發點去解決這問題）有多少兒童與青年需要受教育與技術的訓練；有多少病弱的需要療治與救濟，有多少年老的需要休養。蘇聯的建設計劃，純然要使大眾的生活，達到理想的水準，一點也不顧慮到任何私人的利潤。

不明瞭蘇聯真相的人，並且是靠投資的利潤而生活的人，慣常會這樣問「蘇聯整個社會環境的改造，是不是將減削個人的自由呢？」是的，這對於少數的資產所有者，確

將減削他們的自由，因為在蘇聯，就是一個資產所有者，也必須做對於整個社會有益的工作——不管是勞心的，還是勞力的，方能舒服地生活下去。任何人不能收買勞動力，為個人的利潤而經營任何事業。

蘇聯的民衆已經認識清楚，社會環境的壓力，以前曾剝奪他們充實的生命之自由與機會，現在這壓力却經過了改造，給予每一個人選擇職業與選擇居住的較多的自由，給予每一個人較多的休息與假期，給予每一個人較多的消費品，給予每一個人較大的責任與酬報，使每一個人估量他自己的能力，有積極參與集團工作的機會。

以上所述各點，是否相當於個人自由的確實的提高，將因觀點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如果以為世界上的資產所有者應該不受拘束地任性做去，則我們自然不能說社會環境的統制與改造將增進他們的個人自由；然而，倘使以為世界上五分之四的無產大眾應該擴展他們的選擇機會與創造力，那末，我們就不能不說社會環境的統制與改造，確將增進他們的個人自由。

六 蘇聯的出版事業

華盛頓聯邦政府的出版部，在美國出版界中，可算是龐然大物，英帝國文書處的出版物，也較西歐任何政府的出版部為多，但這些國家出版部如果與以營業為目標的紐約、波斯敦，或倫敦伯多諾斯多街及艦街（Paternoster Row and Fleet Street）的出版商比較起來，則相差頗遠。只有蘇維埃共和國的政府替人民統盤打算，供給一切書籍，小冊，報紙及雜誌，視為改善社會環境的任務之一。

蘇聯政府的偉大出版業，並非集中於單純的獨佔。蘇聯的國家總出版部屋吉斯（Ogiz）從前叫鄂西斯達（Gosizdat）設在莫斯科，全國設數十處出版分部，均與總出版部密切聯絡，均不以營利為目標。總出版部成立於一九一九年，在一九三二年間，銷售新

出版的書冊四千種，計六萬萬張，（每張計十六頁四萬字母約合英文八千字）這個數目已經超過英德兩國每年所出版的總數，即版數也每較各國為多。

但上面的總計，尚只限於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的本部，烏克蘭共和國還有國家出版部（D.W.C.）每年發行烏克蘭語的出版物五千種。其它聯邦共和國均有性質相同的，規模較少的出版部。職業組合，消費合作社，紅軍，大工廠及其它公共團體，均各自發行出版物。自一九三一年後，蘇聯的教育部有獨立的出版部，刊印關於科學的及專門技術的書籍，政府各委員會則發行各種叢書，如內戰歷史，特殊工廠歷史等，此外如列寧堡作家協會及共產黨，均有書籍出版，至於大規模的日報，大概由不同的機關發行。

所以蘇聯的出版事業雖然多是國家經營的性質，也不以營利為目標，但毫無出版家恐慌的現象，除了近六千種的報紙，雜誌與評論，每天的每週的或每月的銷數達四千萬份以外，蘇聯以出版家每年所出版的新書籍及小冊，約計五萬種，九萬萬本之多，這個數目至少同英國、德國及美國的出版總數相等了。可是在二十年之前，俄國成了人口的

半數還是目不識丁呢！

蘇聯的出版事業能夠達到現在驚人的發展程度，乃是十二年來拚命努力所致，在一九一四年的舊俄時代，書籍小冊的出版總數，僅爲一萬三千萬本。在革命後的十年間，出版總數的增加遲緩，到了一九二八年，不過較一九一四年超過一倍，可是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的四年間，出版總數三倍於一九二八年，而據今年的統計，出版的書籍小冊將較革命前一年超過八倍。從波羅的海起至太平洋爲止的每一個蘇聯人民——男人、女人以及孩童，可以分配到六本的數目，至於定期刊物如報紙、雜誌及評論等，一九二八年的平均銷數，不過三倍於一九一三年，到了一九三三年，更突增三倍，已較一九一三年超過九倍，差不多每一家閱讀一種刊物了。

蘇聯的出版事業，在政府的財政方面，是一種很好的收入。自一九二四後，莫斯科國家總出版部的收入，已經超過從前一倍，在一九三二年則達二萬五千萬盧布，合美金一萬二千五百萬元，其中一萬二千萬盧布爲總出版部所發行各種書籍小冊的收入，每年

所得的淨利在三千萬盧布以上，合美金一千五百萬元。

據列寧在創辦莫斯科總出版部時的計劃，要用各種不同的語言，刊印廉價的對於文化上認為是必要的書冊，使蘇聯的每一個家屬，都能夠有閱讀的機會，共產主義的革命，並非僅限於改善大衆的物質生活，同時還要提高大衆的文化生活。簡而言之，蘇聯政府所欲完成的是要以有計劃的環境，去代替大衆的無計劃的環境。據列寧的意思，書籍、小冊、報紙與雜誌等，在建設有計劃的社會環境一點上，是負着重大的任務，不能讓它們聽天由命地去生存發展，也不能讓專爲自己營利的資本家去摧毀。所以，蘇聯政府必須計劃並決定要出版些什麼書，且必須考慮應該照什麼價錢出售，才能普遍。

我們現在對定期刊物，姑暫置勿論，先來考查一下書籍與小冊的出版狀況。蘇聯一萬六千萬人民所閱讀的書冊，一年比一年地激增着。書冊的形式與大小是十分懸殊的，從『史太林同志』演說的小冊子起，這小冊子只有薄薄的兩頁，每版計二百萬份，每份只賣一分錢，直到一九三一年爲紀念達爾文誕生百年祭而譯印的達爾文全集，共計八

厚冊。達爾文全集一萬部於一九三一年出版後，到一九三二年五月即告售罄。莫斯科總出版部乃繼續添印一萬部，改爲十冊，定名『紀念版』不久就可發行了。

廉價的，樸素無華的小冊，佔蘇聯出版物的大部份，但也有精裝的巨帙，翻印各陳列館所搜羅的最名貴的繪畫，不單藝術的品質十分優美，就是技巧方面也甚爲精審。出版的書冊達五十餘種語言，包括佔據特殊地域的，與不佔據特殊地域的少數民族的各種語言，後者如散佈於四方的吉伯賽人，西里亞希伯萊人，以及沿北冰洋的游牧部落。蘇聯各種民族的作家，除用自己民族的語言從事著作外，在翻譯方面，也是非常發展的。他們大多數用俄文與烏克蘭文翻譯英，德，法，意大利，西班牙，瑞士，捷克等國的科學書籍與關於專門技術的書籍，但小說，戲劇，詩歌，歷史以及音樂等各國的著作，也儘量地在翻譯着。

純文藝的書冊到底有多少，佔據若干成數，殊難置答；但這比例的成數至少與舊俄時代相等，所以我們可以說實在的數量要超過舊俄時代八倍。蘇俄新舊文學家的作品，當然值得重視，從英，德，法，美各國文字所翻譯的小說與戲劇等，銷路都很暢旺。據莫斯科

總出版部宣稱，本年內將譯印佛拉貝爾與貝爾扎克的全集，誰說蘇聯出版的文學作品都是『宣傳品』呢？

最使遊歷者吃驚的，或許還在於各種書冊的版數之廣，莫斯科總出版部於一九三一年所銷售的書冊，計四萬種，六萬萬本，二十八萬萬張，即每本平均為七十頁，可見較爲充厚的書籍，爲數亦不少。如馬克斯列甯哥德與達爾文全集，每集四十厚卷至二十厚卷不等，據統計，一九二九年所刊行的各種書冊，初版的平均銷數爲一萬零七百本，至一九三一年，則增至二萬五千冊，如將屬於『大眾文學』方面的各小冊，要綱，初學入門等，與較爲充厚的文集分別而論，則前者在一九二九年的初版銷數爲一萬六千五百本，在一九三一年增至五萬四千本；後者在一九二九年爲四千二百本，在一九三一年增至一萬一千六百本，童話的初版銷數，就是二十萬本也並不希奇，至於馬克思或列寧的著作，不管是一陳舊的，局部的，或暫時的，平均每版要出到十萬本。

蘇聯的大學教授，雖然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並無聲譽，但他所編著的政治經濟學教

科書，據一九三二年的統計，初版竟達十萬本之多。就是關於深奧的、高級的科學理論，初版至少需五千本，蘇聯著名生理學家派夫拉夫（Павлов）曾試驗有條件的與無條件的反射作用，當他要發表試驗的心得時，莫斯科總出版部開始就印行二萬本，每本售七盧布，計美金三元半，這價目是很貴的，可是，不久二萬本就銷完了。這在英國或美國的經濟學家或出版商看來，一定要感到興味的。

更如在一九三二年譯成俄文的『黑格兒智識百科全書』（Hegel's Encyclopaedia of Knowledge）第一卷，包含黑格兒的邏輯學，我們知道這是非常艱難的工作，但初版五千本，不到五天就售罄，二版一萬本，一月內也完全銷去，於是三版又添印一萬五千本，據調查，銷路仍然暢旺如常。可見這樣的版數還不能滿足要求。一般人責問爲什麼不多印，莫斯科總出版部解釋道：沒有足夠的紙。蘇聯的紙廠雖加工趕造，仍不能供給印刷需要，總出版部向上面請求，但被管理五年計劃的當局拒絕，因爲沒有多餘的勞動者去造紙。

巨量書冊的分銷，在蘇聯廣泛的國境內，顯然是重大的工作。莫斯科總出版部，現在有直接管理的分銷機關七千處，發行全蘇聯所出版的四分之三的書冊。這七千處分銷機關，分佈全國，包括各城市中的七十餘支部，二百餘零售店，四百餘閱讀所，各鄉村中的一百餘書坊及約六千閱讀所。零售店與閱讀所的男女雇員，除規定的薪金外，還可以根據銷數的總額，分派紅利，有許多規模較小的分銷機關，實際上成爲半殘廢的工人，士兵及寡婦等的庇護所。除七千處分銷機關外，莫斯科總出版部還供給鐵路上各大站的書攤及各消費合作社，並且利用烏克蘭或其它共和國各出版部的分銷機關，教育部的分銷機關，以及共產黨的各地支部。

蘇聯書冊銷數的迅速與旺盛，已如前述。但有一點我們必須加以注意，他們不利用旅行商，推銷員或小販去擴展銷數，不在報紙上登載巨幅的新書廣告，也不在數千種的定期刊物上的新書介紹或評論欄內大吹大擂。而且，蘇聯的郵局雖像德國一樣代讀者定購刊物，但對書冊却沒有這種辦法，在德國或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郵局，恐遭強有力

的書業的反對，所以不願代購書冊。至於在蘇聯，則決不致發生類似的反對，那末，蘇聯的郵局爲什麼不採取這種辦法呢？這大概由於蘇聯郵局的工作效率低緩，辦事人員不熟練，難與進展不已的郵務相適應的緣故。

莫斯科總出版部推銷書冊，現在主要地依靠兩種圖書目錄，按照規定的期間遞送。一種每隔六天出一次，詳載一星期間出版的約六百種的書名，價目及大小，寄給莫斯科及莫斯科附近兩千餘主要的圖書館與俱樂部。還有一種稱爲『蘇維埃書業』（The Soviet Book Trade），是目錄與批評的綜合，敘述新書的內容，每隔十天出一次，每次計一萬五千份。總之，蘇聯的面積雖廣泛，出版的書冊雖暢旺，在分佈與銷售的費用上，却比美國或英國來得經濟。

我們要瞭解蘇聯書冊的分銷制度，必須先瞭解蘇聯的書冊是屬於大衆的供給之一，初級小學的兒童近二千二百萬，所用的教科書，非儘量趕印不可。此外屬於『大衆文學』如演說辭，大綱，初學入門等的各種小冊子，定價低廉，以求普徧，大批地運到各處的

分銷機關，像此類書冊自然無須怎樣宣傳。可是，就是關於專門學術及高深理論的書籍，即使售價較昂，不在廣告上怎樣宣傳，銷售也甚為迅速，這却不得不使我們表示奇異了。

我們要明白這原由，須研究『團體讀者』的急速進展的狀況。數千萬永久性質的公共圖書館，都準備着購買新書的經費，自最高的至最低的各教育機關，各俱樂部，各職業組合，各消費合作社，各共產黨支部，列甯少年團，以及其它各種團體，都努力購置新書，以備陳列與閱讀。所以，剛在圖書目錄上發表的新書，各圖書館的定購單，就像潮水般湧去，卡也夫或客庫夫（Kiev or Khakov）地方的大學教授常常這樣發怨言：如果知道一本新書要出版，必須立刻定購，否則就要冒『業已售罄』的危險。

各大學及高等學術中心的教授及講師有一萬人，初級小學及高級小學的教員有五十萬人，學生則不計其數。此外，尚有數百萬的工人與農人，現在被激勵着進學校，受工廠課程，勤奮的精神，實為美國或西歐各國所罕見。有這樣大量的，濃密的需要，所以不必依靠昂貴的分銷制度，而能獲得廣大的銷數。

分銷開支上的擲節，使書冊的價格可以比較低廉，而價格的低廉，又可以說明廣大的需要，因為出版事業的目標並非單純的營利，而為最高度的銷數，故價格的估計，完全根據於成本。普通一張（即十六頁）的零售價格為十個小銅幣（合五分），一百六十頁的紙面書約售一盧布（合五角），布面書略貴，精裝厚冊售到七盧布，（合美金三元半）一本，算是稀有的貴書。莫斯科總出版部有三十餘處的印刷所與裝訂所，天天在加緊地工作着，一切出版的事務，由它自己經營管理，不須經過剝取利潤的中間階級。

蘇聯出版事業的試驗，所以能夠這樣成功，其主要的基礎乃在於廣大民衆的閱讀狂。所謂廣大民衆是指自十歲到五十歲的五六千萬人，他們大部份已成爲各種出版物的貪婪的閱讀者。單以數量而論，蘇聯過去五年間對於書籍需要的激增，在世界史上確是一件空前的事情。

據我們平常所得的消息，在蘇聯酬報最高的職業是書籍，戲劇及集納文學的著作家，這在過『文墨生涯』的人聽來，或許覺得很有趣。莫斯科有一位著作家的收入，一年

竟達七萬五千盧布，合美金三萬五千元，至酬報的方式，普通由著作家與莫斯科總出版部訂立一種私人契約，總出版部規定稿費的整數，向著作人購買原稿，及印行規定冊數的出版權。稿費的規定，普通須考慮：（一）著作人的名譽與地位，（二）著作所需的思想勞働總量，（三）出版數目的多少。譬如在發行之前，出版的數目增加，或覺得有增加的必要時，則按照增加的確數為比例，酬報著作人。如再版書需著作人修改，則依新書的辦法。普通初版書的稿費，小說每張為三百盧布，合美金一百五十元；初版教科書每張一百五十盧布，合美金七十五元。譯著的外國書，每張為七十五盧布至一百盧布，合美金三十七元至五十元；高深學術的著作每張為一百五十盧布至二百盧布，合美金七十五元至一百元。蘇聯普通的書籍，約計十張，即一百六十頁，就是說，一部短篇的小說稿值美金一千五百元，同樣厚薄的科學著作值美金七百五十元至一千元。戲劇作家除出賣版權的稿費外，還可從戲館方面分派座價的收入，所以，蘇聯的戲劇作家，同各國一樣，獲得最高的酬報。

蘇聯的熱望的作家，自動地將戲劇，小說詩，歌，論文，歷史或經濟理論的，原稿送呈莫斯科總出版部。審核之後，總出版部便通知著作人，給付稿費。蘇聯青年的與無名的作家，是否比較在德國或美國容易發表他們的作品，我們無從估量。但蘇聯各共和邦的國家出版部往往選擇有希望的青年無名作家，與樂譜家，甚至資助他們，以求深造。這樣選擇出來的人才，願意接受國家出版部的建議，向特殊的工作繼續鑽求，對於他們在計劃中的作品，由國家出版部先給予百分之二十五的酬報，不附退還的條件。到作品脫稿的時候，倘使允許隨時修改，再給予百分之四十的酬報。到出版的時候，其餘百分之三十五的酬報，便如數給予，並保證如第一次的冒險成功，將再允許第二次的嘗試。這樣政府的選擇方法，是否能夠產生文學上的或音樂上的天才，自然成爲問題，但至少對於貧苦的文藝愛好者，是一種寬大的，有意義的嘗試啊。

蘇聯的一切出版物，就是實際上隸屬於政府的公共機關的出版物，也必須經過審查的許可，這在大多數的英美人看來，是一種侮辱，一種障礙。蘇聯出版的任何書冊上，均

有政府審查員的印記，標明號目與日期，凡是猥褻的，譏謗私人，陷人於罪的，侮辱特殊的少數民族與少數宗教的，以及在動向上與實際上是反革命的東西，一概不准出版。

不論我們怎樣厭惡審查，却沒有一個文明國家，不行使審查權，不過形式互異罷了。其實，審查的所以要受反對，與其說由於原理，無甯說由於實施，就是共產主義者也這樣解釋。英國與美國的審查權，實際上操在警察與縣長的手裏，他們在特殊的時期，特殊的地域內，如果以為某種書籍是淫猥的，或煽亂的，就加以扣留，加以禁止。大多數思想激進的著作家歡喜這種方法，因為他們的嚴重的作品，讀者有限，不容易引起警察與縣長們的注意。可是，這種方法對危害社會道德，流毒於公正人民的出版物，却無法阻止暢銷。蘇聯的方法則主張一切作品在未出版之前，經過有訓練的，合格的機關審查，決定取捨。這樣，各國要想禁止發行而不能够阻止的現象，在蘇聯不至於發生。

莫斯科審查委員會（Gal'tvi）在每一個印刷機關派駐代理人——這代理人往往就是印刷機關的經理人，他的唯一的責守是確定一切上印刷機的出版物，必須先獲得

印書執照。報紙與外國訪員新聞檢查，也訂定辦法，大概負責的與機敏的外國訪員，不致感受許多困難。輕率的或惡意的事實之誤述，當然要被禁止，至恰當的，合理的批評，有時雖然暫行延擱，以待詢問或商榷，但並不加以干涉。講到書冊，審查的本身實無多少重要性，因為出版業當局的決定，較審查員有力量，並且，因為沒有企圖私人利潤的動機，出版業當局不致受利潤的誘惑，背離「總路線」。

一部作品如被拒絕出版時，著作人可以要求判斷，或由他所隸屬的職業組合出來解決，或由專事剷除官僚主義罪惡的工農糾察團（Workers and Peasants Inspection）特別調查，或由最高的政府當局出來干涉。而且，即使是經過出版當局拒絕的作品，著作人可以向印刷機關接洽，自行出版，同美國或英國的情形一樣。

書冊的供給，究竟依靠有調節的，不為私人營利的政府機關去辦理，是否較勝於以獲取最大利潤為目標的資本家的自由競爭，這樣的論斷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我們知道一種出版事業的存在，具備着社會的條件。所以最好是去考慮兩種方式的缺點與弊病，

就是說，怎樣利用集體辦法去使專事營利的出版事業有益於大眾，怎樣容許特殊的個人行動的自由發展，去滅除絕端集體主義的若干缺點。這些問題或許富於公共心的美國出版家與精密的蘇聯官吏們，正在考慮着吧？

七 蘇聯的婦女兒童與家庭

各國人士對於蘇聯生活的見解，差異得最利害的部份，大概要算蘇聯的家庭組織。關於這一個問題，要去獲得確實的，可信的詮釋，包含調查的各方面與蘇聯的各部份，也可說是最為困難的。所以，我們只能從這問題的若干局部的要點，歸納到一個概括的結論。

我們必須先瞭解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所給予蘇聯婦女、兒童及未成年者的影響與轉變，就是說，性質是怎樣，程度是怎樣。在蘇聯社會中，少數的貴族婦女，與次等貴族，政府官吏，地主，以及資本家的所謂優良婦女，差不多是銷聲匿跡了。有些是在革命最初的數月中，農民發生大暴動時殺掉的。有些是在紅軍與白軍鬥爭報復的兩年內戰的驚濤

駭浪中殺掉的，這兩年的內戰，由於美，法，英，日，捷克，等國的派遣隊援助白軍，那些「上流」婦女的殺戮，並不能全叫蘇聯政府去負責。自然，從革命迄今的十五年中，有許多婦女是死亡了。不過，她們遷居出國的還是佔最多數，她們及她們的家族現在已成爲法，意，奧，波蘭，羅馬尼亞，希臘，英，美，等國的公民，而不是蘇聯的公民。只有佔少數的少數仍居留於蘇聯，但她們也漸漸地淪爲無產大眾了。

蘇聯的上等與中等婦女的消滅，對於蘇聯究有多少損失，殊難估量。舊俄時代受過教育而從事於自由職業的婦女，如醫生，科學家，教員，著作家，音樂師，舞女與伶人等，數量不多，但這些仍居留於蘇聯。蘇聯的婦女已經多數接受新的統治，在婦女職業急速的擴展中，她們能夠立足，能夠繼續她們的職業。

我們所欲注意的，並非上面所說的少數婦女，而爲歐戰前俄國的婦女大眾，至少包括全俄國婦女人口的十分之九，她們是貧農，漁戶，獵戶，獨立的手藝，工人家奴，或工廠工人的勞苦的妻子，女兒或寡婦。那些廣大的勞苦婦女的家庭，究竟是怎樣的神祕的一種

存在，我們知道得很少，不過歐戰前的舊俄文學所給予我們的印象，是異常黑暗的。她們大多數是文盲，迷信上帝，完全服從丈夫與父親。其中四分之一是回教徒，罩着面幕，無知無識。

在舊俄時代，十分之九的人民住宅是齷齪，擁擠，不衛生，與西歐城市中最惡劣的貧民窟差不多。災眚，饑饉，與早年的死亡，長期地撲滅着農民大眾，像中世紀的歐洲一樣。醫藥的設備十分不普遍，母親雖然愛護她們的子女，但兒童與嬰孩的死亡率却非常高。勞動婦女不滿五十歲，就很衰老，至於丈夫的忠實與未婚女子的貞節，自然沒有統計可考。

我們現在來觀察革命後的蘇聯婦女，到底經過了怎樣的轉變，或怎樣地在轉變着。

共產主義革命對於蘇聯婦女的地位，有三點明顯的影響。第一，蘇聯的婦女在法律上獲得完全的解放。第二，蘇聯的婦女在教育上獲得與男性完全相同的平等。第三，蘇聯的婦女，因有計劃的社會環境與經濟環境的建設，減除她們母性的與家務的特殊負擔。婦女滿了十八歲就獲得同男性一樣的選舉權，有加入職業組合與消費合作社為會員的同

等資格，有升遷的被選舉資格。一切職業與一切地位，男女的機會完全平等。工資，假期及保險利益的規定，沒有男性女性的歧視。婦女的職位並不因結婚的關係而被褫奪，雖然她們爲生育與撫養兒童，往往自願放棄若干年的工作。結婚與離婚的法律所規定的權利與責任，男性與女性是一樣的。在工廠中工作的勞働婦女，獲得特殊的權利與保障，如分娩前後可請假十六個星期，工資照給，每隔數小時可離開工廠哺養小孩，每個工廠設立託兒所，寄養年幼的兒童，使她們可安心工作。

這許多改革與轉變，並非僅爲法律上的條文，到蘇聯去視察的人，可以真切地看出什麼地方都在實行着。在工業專門學校中，女性的學生佔據半數，她們學習工程師，建築師，電氣工程師與機械師，在任何工廠裏——不僅限於輕工業的工廠——女工同男工一樣地在旋盤或鍛鐵爐的旁邊，做着最吃重，最煩苦，而且是同樣熟練的工作。在鑛穴與油田中，男性的與女性的工人，一樣地工作着。近年來蘇聯商輪上的女水手，女工程師及女無線電收發員，逐步地增加起來，婦女充當膳務員，廚司以及清潔伙，也有逐步增加的

趨勢。大部份的學校教師是女性青年，醫生中的女性，也要佔去半數以上。婦女不僅為各機關辦公室的速寫員，並且充任翻譯員，機要秘書及負責的助理人員，在數量上均一天天地激增着。

蘇聯有許多機關與團體的監督或經理是女性，她們管轄數百或數千的男女職員。現在莫斯科的『文化休養園』(The Park of Culture and Rest at Moscow) 的監督是一位女人，各部份的男女僱員達三千人。各蘇維埃均有婦女被選，各聯邦共和國常常有婦女充任各部委員長，蘇聯政府的各部中，也常常有婦女充任首領。柯倫泰夫人 (Mme. Kollontai) 曾歷任駐墨西哥與諾威等國的公使，現仍任駐瑞典的蘇聯全權公使。

關於工作的酬報，不獨男性與女性毫無歧視，就是已否結婚，已否生育兒女等問題，也不加以查詢的。在英國或其他數國，有幾千或幾萬女性的學校教師及公務員等，均不敢結婚，因為一結婚就會失去原來的地位，蘇聯則決沒有這樣阻礙婚姻的事情。

上面所講的是指在繁榮着的都市中的婦女，指城市與鄉村共同需要着的職業婦

女。不過，佔蘇聯婦女人口的最大多數，當推從事於耕種及漁獵的婦女，就是說，從事於鄉村職業的婦女。蘇聯的農村家庭（包括漁戶獵戶）共計二千五百萬個。這二千五百萬個農村家庭中的婦女的地位，現在究竟怎樣呢？這是我們所要知道的問題。事實告訴我們她們也同產業的勞動婦女與自由職業婦女一樣，獲得法律上的解放。就在廣漠的回教徒的區域，婦女也自由了，有數百數千已經廢除面幕，學習書寫，同時她們的兒女均可送到當地的學校去讀書，而進專門學校或大學的兒女，也一年一年地加多起來。

事實上，凡是城市所能夠享受的教育，醫藥以及社會保險的各種機會，蘇聯的政府無疑地均在設法介紹到鄉村中去。自然，鄉村方面終要比較城市方面落後些。譬如說，城市中的男女兒童差不多每一個都在學校裏，但在蘇聯那樣遼闊的疆土上，自波羅的海至太平洋，自波斯邊境至北冰洋，包括許多為原始民族及遊牧民族所佔據着的部份，自然不能一概而論了。除教育以外，每年有大批的醫生——多數是女性派遣到鄉村去服務，大大小小的產科醫院與普通醫院，也一年一年地設立起來。

然而，土地如果像中世紀的英國那般分割着，由個別的小農各自耕種，各自收穫，則鄉村婦女的家庭環境與社會地位，難有改進的希望。所以在落後區域的三四千萬的居民中的婦女，雖獲得法律上的解放，但衛生醫藥及學校等的設備，仍在幼稚的狀態中。

鄉村婦女的社會環境，開始受着最大的影響與轉變，這僅是五六年前的事情，那時集合農場的合作運動開始，代替各個家族的生產方法，這運動目前仍在進展着，各地集合農場的數量與集合組織的程度，每年呈穩定的增加趨勢，至一九三二年為止，一千八百萬的農民家族，約計七千萬的人口，已經加入二十二萬六千個的集合農場，有幾區的土地，甚至完全歸併到集合農場。集合農場到底怎樣影響婦女與兒童的地位，這是我們所要討論的。

在一個集合農場裏，農民普通可以保留他們的房屋（或者建造新的），牛，豬，家禽及園圃的隙地。在目前，採取完全共產集居的形式，集合農場還很少，就是說，僅有少數的集合農場達到『一切生產共同合作，一切收穫共同享受』的境地。一般的集合農場

僅在穀類的播種與收割是共同合作的，收穫的穀類按照比例分配給政府與農場的男人，因為政府供給拖曳機，種子與肥料，而農場工人則出勞働力。至農場男女工人間的分配穀物，則根據每個人實在勞働的日數或時間。

農場的集合化並非限於這樣簡單的生產與分配。農場裏成年的男女會同着管理農場的委員會，召集會議，討論改善農場的設備與生活，如建造適宜的穀倉，原始的秣糧室，新式的牛奶場或製酪場，新的校舍或村議會所，包括圖書館，跳舞廳及影戲院的俱樂部。慢慢地，託兒所也會設立起來，母親們要到牛奶場，製酪場或農場上去工作的時候，可以放心地把她們的孩兒寄託在那裏；此外，還會設立公共廚房與膳廳，甚至設立廉價的寄宿所，以便獨身者或鰥夫寡婦的寄宿。自然，這些改善須經過相當的時間，而各個農場的集合生活的擴展的秩序，自然也不能完全一致。集合農場的進展，往往因許多乖戾農民的忽視工作與故意隱伏，及管理方面的不完全，而遭受阻礙，但這種困難，必須經過慘苦的不斷的試驗，方能克服。

這裏，有一點我們不能加以忽視，從集合農場運動開始以來，對於婦女的地位，便發生了一種社會革命。從前在木架的泥土屋中過着的農村生活，從前在各個田莊上勞働着的孤寂生活，現在完全轉變了。究竟二十二萬六千個集合農場的狀況是怎樣，我們不能夠一個一個去親自觀察。但據曾經屢次觀察許多省集合農場的人說：不管農場的發展效率，達到怎樣的程度，老年的農民仍不願歸到新的集合組織之下，仍表示頑強，可是他們的妻子兒女却一致歡迎這種轉變。

自有生以來，她們第一次能夠用自己的錢。她們一天只須工作八小時，不要終日工作（就是母牛，在二十四小時內也只取乳三次。）她們現在可以享受共同工作的愉快，不感到在自己的田莊上獨自工作的苦寂。她們不再囚居在黑暗的，死靜的，泥土的鄉村中，現在可以享受音樂，跳舞，無線電，影戲，各種的書報與偶然的演講。雖然鄉村離開城市很遠，農民不容易到城市中來，但城市中的一切，却被設法移植到鄉村中去。這是在過去七年間，集合農場運動所給予蘇聯鄉村人口的三分之二的解放，尤其是對於婦女與兒

童，我們實在無從加以估量。

蘇聯的兒童與在十八歲以下的未成年者，約計七千萬，幾佔全人口的半數。他們所受革命的影響是怎樣呢？我們知道在革命前的俄國兒童，只有三分之一的屬於中上階級的兒童，能夠進學校，現在凡十四歲以下的兒童，至少有五分之四可以受到比較優良的初等教育了。在一九三二年，這些在學兒童的總額為二千一百九十萬，男女各半，較一九一四年的在學兒童要超過三倍，幾佔全人口的八分之一，這同英國與美國的在學兒童比例，不相上下。

初等學校畢業後，男女兒童進中等專門學校，學習專門職業，這數量是有增無減。許多工廠學校，專為青年的生產生力軍而設立，他們在未成為生產的勞動者之前，均受幾個月的訓練，對於各種機械的使用，給以實際的智識。蘇聯設備最完善最著名的專門大學約計一千所；無產階級的女子不僅有投入任何新舊大學的優先權，並且還有充份的獎學資金。

由八歲至二十五歲的一千萬兒童與青年，在學校與職業之外，組成三個自動的集團，就是十月團（八歲至十歲）、先鋒團（十歲至十七歲）及列寧青年團（十七歲至廿五歲），受着最有希望的大眾訓練，準備到廿五歲時，可以加入選擇最謹慎，訓練最嚴格，權限最集中的共產黨，為正式的候補黨員。

蘇聯每一種事情的理想，往往勝於實行，訓練全蘇聯的七千萬兒童與青年的偉大計劃，自然在實行上也不能避免這一點。最顯明的，是各等各種師資的缺乏。許多校舍是臨時築成的，仍在不相宜的狀態中。因為校舍不夠，有時學校分開日夜兩班。高等學校與大學的教育，在質量上相差頗鉅。最近曾縮短訓練學期，以謀速成較多的工程師，教員及醫生等，應付最迫切的需要，但仍無濟於事。可是，雖然是這樣說，蘇聯在這幾方面，每年均有確切的進展。在過去三年間，能夠每年增加教育上的公費，恐怕只有蘇聯一國吧。

蘇聯訓育兒童與青年的計劃，固屬重要，但訓育兒童與青年的新精神，則尤為重要。父母們常常這樣想：兒童是未來國家的公民與社會的生產者，必使他們或她們的才能

發展到最高度，所以在各種形式的宣傳中，必須尊重兒童的人格與個性的最高度發展。在學校與家庭中，不應該僅用禁止的方法去對付兒童，應該勸誘他們或她們去選擇較好的方面。蘇聯的法律，禁止敲打兒童，並且列為一種罪名。兒童在受任何責罰的時候，感到一種侮辱，所以做父母的應該極力避免責罰兒童。不論在家庭或學校中，兒童必須訓練自治，即使家長與師長感到不悅意，也沒有辦法。未成年的兒童在各個階段所得的訓練與教育，是服務於家庭，學校，工廠，社會或國家。兒童在給養，教育及醫藥方面，均不致發生困難。嬰孩與兒童的死亡率，顯然一年一年地在減低着。

遊戲的玩具到處有出售，價錢都很便宜，室內與戶外的遊戲或娛樂，設備得很多。但玩具也同課程或書本一樣地包含着用意的。沒有洋鐵皮的兵，洋囹圄也少見，所有玩具大多數是造屋的磚塊，實用物件的雛形，機頭，飛機及汽車等的模型，使將來的全國民衆均有『機械的頭腦』。託兒所的標語是：『遊戲是創造的勞働之準備，不僅是單純的玩耍。』先鋒團的團員常常結成小團體，自動地去參加社會工作，如在功課上幫助比較年

輕的或落後的兒童，肅清鄰近的成年文盲，掃除污穢與垃圾的堆積，組織突擊隊去加強趕不上預定計劃的生產，或者去擔任不能延遲的工作。

前年，莫斯科先鋒團的團員召集各影戲院與影片公司的監督，發表關於一切出品的意見，並指摘一切出品的缺點與短處。離開列甯堡約二百哩的一個鎮市上的先鋒團團員，因為麥酒暢銷，便發起清除麥酒運動。他們在每一個工場中貼着這樣的請求書：

我們都是你們的兒女，現在請求你們不要喝酒，幫助我們來關閉酒店，把酒店改爲我們的文化機關，先鋒團俱樂部以及閱書室等。我們告訴你們，如果父母是歡喜喝酒的，他們的兒女在學校裏的成績，往往是落後的。你們要知道，一瓶酒的錢可以買一本教科書或者一本練習簿。請你們接受我們的呼籲，使我們成爲充份發展的，健康的，有教化的人類。我們必須要有格外安甯的，舒適的家庭環境，本區十月團團員，你們的兒女們謹告。『兒童在工人區中整隊遊行，學校音樂隊悠揚地前導着，並且召開民衆大會。結果，據說馬上有幾百個工人允許不再喝麥酒。』

兒童與未成年者的解放，以及對於參加各種社會工作的積極鼓勵，自然容易釀成他們的自負心，並對不努力，不整潔的長輩，加以不客氣的批評的態度，使大部份的年長者感到不愉快。譬如說，開窗而臥的衛生習慣或許是很好的，但他們連別人的窗子也去開着，因此往往使他們年長的親戚發出怨言。可是，要從污濁，災害，渾噩，偷竊以及粗暴的革命前的狀態中，把俄國的人民拯救出來，這種共產主義青年的自治訓練，是非常美妙的工具。

五六百萬先鋒團與列寧青年團的男女團員間的性道德是怎樣的呢？這是很有趣的問題。這樣廣大的組織，使蘇聯的青年男女間，發生密切的社會交際。在學校中，各級的會議中，委員會中，代表大會中，以及共產主義青年同盟執行委員會中，他們與她們常常在一起；在運動與遊戲時，在社會調查時，在參加突擊隊時，以及一切自動的社會工作時，他們與她們也常常在一起。在他們與她們間，衛生方面的自我約束與生育方面的完全負責，似乎是最顯著的地方。蘇聯的法律嚴格地規定父母對於所生育的兒女，應該依照

雙方的經濟狀況，負撫養的完全責任。根據於自身健全與父母責任的兩要點外，青年的兩性關係有絕大的選擇自由，沒有一點罪惡的意味。自然，決不可使性的關係影響到研究或生產的效率，也決不可為性的關係而浪費時間與精力。這些事情在列寧青年團的團員看起來，和沉溺於賭博，喝酒與抽煙等，同樣是不良的習慣。

共產主義革命使蘇聯的婦女，兒童與未成年者的生活與地位，起了很大的轉變，這轉變必然地會影響到家庭的組織，而有加以分析的必要。據觀察所得，蘇聯的家庭集團並沒有崩潰的徵象，就是最惡意的報告，也不說蘇聯的父母有故意拋棄兒童的事情。母性愛在蘇聯同在各國一樣，蘇聯的父親們也同英國或美國的父親們同樣歡喜他們的子女。蘇聯的兒童與未成年者對於他們的父母，是否比較英國或美國的兒童與未成年者倔強，這無從測度。不過，一般地講來，二十世紀的各國青年，均不像十九世紀時代那樣就範了。

親友間的交接，每出以爽直的言辭，老實的評斷，不像西歐中等階級的慣於矯飾與

虛偽，不常聽到僞君子的口吻。兒童知道酗酒是墮落的行爲，不僅向別的父母這樣說教，就是對他們自己的父親，也要這樣說教。先鋒團的團員確實擔負着肅清別的家庭及自己家庭間的文盲的責任，並率直地反抗各家庭間的醜態與不衛生的生活。凡是與他們有關係的人發生惡劣行爲——卽反社會的行爲，他們當引爲自己的恥辱。總之，蘇聯的先鋒團與列寧青年團的團員，自始卽擔負起十字軍的使命，爲良好的家庭環境，優美的大衆習慣，以及擴張的社會生產而努力，援助全國一致的生存掙扎。

許多批評家在詢問蘇聯的家庭狀況時，往往下意識地懸想到父母間或夫妻間的性道德。蘇聯夫婦間與其他各國夫婦間的忠實，我們沒有標準的尺度。而且，就是要比較，也須同等的階級方有可能。假使詢問這問題的人，是屬於歐美的上等階級或中等階級，那末，他應該明白，蘇聯現在已沒有這種階級的存在了。所以，我們只能以歐美的工農階級與蘇聯的城市，或鄉村勞働者相比較。

莫斯科及其他大城市，不僅在外表上要較俄皇時代端莊不少，就是較各國的大城

市，也來得嚴肅。凡營業性質的跳舞廳，夜俱樂部及小跳舞場，幾皆不准開設。蘇聯的舞臺與電影一樣，均着眼於性的誘惑以外的表現，而與好萊塢站在極端相反的立場。因為公眾的威權，遏制以營利為目標的出版事業，所以淫猥的書籍完全絕跡。西方所盛行的雜亂擁擠的跳舞，也爲了它的有礙身心的肉慾性，而加以禁止，僅容許在一二個專備外人享樂的貴族化旅館中舉行。莫斯科街上男女勾引的事情，要較任何歐洲的城市爲少。娼妓兩個字，在目前的蘇聯，差不多完全失掉它的意義了。

但在另一方面，蘇聯未婚男女間的兩性結合，只要基於相互的愛慕與友誼，不受年齡的束縛，這比較各國的男女自由不少。這種結合完全不含罪惡的意味，法律與輿論均不加以干涉，後來往往有成爲永久夫婦的。夫婦的任何一方如提出離婚，馬上可脫離關係，但根據法律上的嚴格規定，父親與母親均須依照自己的經濟狀況，對子女負撫養的完全責任。但濫交則極爲社會所不齒。史太林有一次對行爲不檢的重要黨員說：『我雖然不欲干預你的私事，但倘然你對女人仍有胡鬧的行爲，你就要到沒有女人的地方去

了。」

總結起來說，共產主義革命大大地增加個人的自由，普遍地消滅宗教的與傳統的束縛，無疑地在最初的十年間，使家庭生活較為不安定，基於友愛的兩性關係也較為弛懈。同時，如西方國家中各種買賣形式的罪惡，幾乎完全消滅了。但在近幾年來，蘇聯的一般輿論漸漸傾向於婚姻的穩固化，對急促的、粗率的或反覆的離婚，有加以非難的趨勢了。蘇聯男女的離婚與結婚的比例，雖然沒有集中的統計，可資查考，但就據特殊城市與特殊期間的數字觀之，則與斯干迭那維亞各部及美國各州的情形，也沒有顯着的差異啊。